

一方水土

作者：陈国凯

第一章 香港来客

1

公元一九七九年初春。

几天的春雨，把罗湖海关通向深圳镇的土路搞得一塌糊涂。

罗湖海关那边来了几位西装革履的男子和一位打扮入时的年轻女郎。他们说说笑笑，往罗湖桥方向走来。他们说的都是广府话，“点呀”、“点呀”（怎么啦），“系呀”、“系呀”（是呀）的。香港人讲英语在中国一流，一讲普通话，就像嘴里含着BB糖，比广州人讲得还难听。

香港基本上是广东人的天下。广东客家话、广府话（也叫白话）、潮州话三大语系的人构成了香港生态的洋洋大观。香港这个小岛本来隶属广东，广东人开发的。非我族类的英国勾鼻佬后来才带着洋枪洋炮带着鸦片爬到香港谋财害命。早年，没多少人把这台风经常出没的小岛滩涂放在眼里，那时香港算什么呀，连喝水

香港地虽然华洋混杂，母语依然是广府话。英国佬曾经想把香港的语言改成英语，从小孩开始就进行英语教育，但怎么改也改不了。英国佬在香港也是为了刮油，不真想把香港人变成“鬼佬”。有人这样形容英、美两国：美国佬是狗，吃饱了就走；英国佬是猪，吃饱了就躺在那儿，到处搞殖民地。英国佬在香港捞得够多了。香港人员的屎运到英国，也够英国佬肥的。

按人类学分类，亚洲大陆架基本属于蒙古人种。中国有个奇妙现象：从北国到南方，天气越来越热，人越长趋缩水。广东人的祖先也是高大威猛的北方人，同种同族，到了南疆广东，一代代传下来，变得短小精干，变得灵动活泼。广东这地方也怪，肌肤如雪的北方姑娘，在广东居住的时间长了，也逐渐向黄脸婆转化。这奇妙的人文景观，大概是水土原因。一方水上一方人嘛！

广东人就是走到天涯海角，那身材，那肤色，那脸相，那声调，那聪明眼神，那灵动的表情，明眼人一下子就看得出来。

香港有位高人曾经将广东人跟日本仔比较，有个高论，认为这两地人都聪明机警，都是善财至于，千手观音，都是商战高手。不过，从总体看来，日本仔比广东人的智商稍为高了一点。究其原因，是日本人长得比广东人矮。广东人常说“矮仔多计”，就是说，长得矮的人工于计谋。是否如此，只有天晓得了。

这一行人，领头的是香港大华轮船公司总经理方辛。大华公司是中国最古老的企业。

清朝就有了。香港大华公司现在直属国务院某部。今天方辛亲自出马来深圳，是为了实施公司的新战略，计划在大陆开拓地盘，发展业务，想在毗邻香港的深圳搞个工业开发区，在古老的神州一角，施展拳脚，打开禁锢，实行开放改革方略。

方辛行伍出身，饱经沧桑的脸上有一道不太明显的刀痕，隐含英气。言行举止，有着明显的军人风度，没有一般商家佬的滑头相。香港盛产纵横捭阖的商界奇才，也盛产皮笑肉不笑的滑头商人。

今天来深圳，同行的都是方辛手下的职员。公司发展部的杨飞翔经理，戴着金丝眼镜，长得一表斯文，是商业谈判的一等好手。那一对金童玉女，男的叫曾国平，女的叫凌娜，都是发展部的业务骨干。这对青年人在香港长大，标准的香港口音。

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也很热闹。

昨天是休息日，公司里一些同事结伴到狮子山黄大仙庙宇游玩。凌娜小姐也把方辛拉上了。那儿风景幽美，钟灵毓秀。一到假期节日，游人如炽，十分热闹。

广东人没有正规的宗教。有庙就有神。谁也说不清广东有多少神仙。香港就更古怪了。香港人的迷信出了名。相信风水八卦，流年运程。家家户户，都有神龛，不是观音，就是财神。电光香烛，长明灯火。好像有了这些便消灾纳福，家家安泰，户户平安。有些人挪个床位打个喷嚏都要翻查通书，看看是凶是吉。香港警察部门也供着关圣大帝的神位。香港地把中西文化鬼马神明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奇特的文化景观。

说起来也像笑话，黄大仙这个神还是广州人送给香港的。黄大仙原来是广州郊区一个寺庙的神。广州的神仙多，在神仙排行榜上，黄大仙像三流歌星，没多大名气，参拜的人也不多。那年广州战乱，庙宇衰败，神仙自己难保。有个来往粤港两地的商人看见黄大仙可怜巴巴地呆在庙里，香案冷清，没有香火，一片风雨飘摇，动了恻隐之心，把黄大仙神像拎下来弄到香港，垒些砖头，立个寺庙。黄大仙到香港交了好运，被香港人越拜越大，成了香港大名鼎鼎的神仙。如今香港地，有人不知孙中山，谁人不识黄大仙！

黄大仙庙宇前边，一位仙风道骨的白眉相士在论人断相。公司的同事看此人有仙家风骨，又听旁边的人说老者是有名的“铁嘴”，说吉卜凶，无不灵验，就争着找白眉老者看相。

方辛人来不相信江湖术士。早在广州活动，跟广州有名的“江相派”算命佬打过交道，上过“老千”（骗子）的当，多少懂得这类人如何出“千”（行骗）。看见许多人在那儿至诚至恭地请人看相，觉得好笑。方辛看这人的神气，不像开口《麻衣》，闭口《柳庄》的土相士，倒有点像懂得“师门三宝”的“江相派”弟子。

白眉相士皂履长袍，一把描金折扇，一副权威架步。公司文员凌娜小姐给方辛交了相金，硬要方老板看相。

“你也多事，我这相貌有什么好看的？”方辛说。

“大家都看。老板，你去看看相又何妨？图个高兴嘛。又不会损皮损肉。”

大家都鼓动老板看相。方辛不想扫大家的兴，抱着游戏心理去凑凑热闹，听听这江湖术士口出何言？

白眉老者扫了方辛一眼，问：“先生是算命，还是看相看流年气色？”

“看相吧。”方辛笑笑。

白眉老者出术了，一开口就下断语，出语惊人：“先生，你有异相。”

方辛问：“何异之有？”

白眉相士说：“先生三停得配，地阁圆丰，威藏五岳朝天府，眉横日月人中龙。不是一般相格，此乃非凡之相。先生有此相格，必主大富大贵。”

方辛笑了：“富从何来，贵在何方？”

“先生富从南来，贵在北方。”白眉相士话音一转，“当然，人生在世，不是一路风帆。偶有霁风淫雨，诸多阻滞，先生命宫中曾有凶星，已被‘月空’、‘地解’两星化解。雨过天清，吉星高照。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先生有此福相，日后的荣华富贵，非一般俗世之人所能企及。先生是聪明人，就无需我多讲了。”

老者看在银纸分上，再送几句：“先生的运道在北，宜向北行。不过，有一点请先生留意，先生眉宇间有一股若明若暗之气，直犯天官。需谨防小人。”

这是废话。生活中到处都有一些小人。谁不防小人？这是做人的基本常识。算命先生这些话说了等于没说。

老先生几句话，就刮了两百块港币。看来，真正能发财的还是算命先生。

方辛笑笑。白眉老先生真的看错人了。他一辈子奔波劳碌，为共产党打天下，坐共产党的监狱。到了香港，虽然是握有实权的总经理，也是在共产党公司里做事，发不了财的。他一生坎坷，既无大富，也没有大贵。老婆过世后没有续娶，至今还是光棍一条。

可见相家术士之言，不过是江湖老套，见人出“千”而已。

今天，同行的人还说起昨天看相的事。凌娜小姐跟方辛开玩笑：“老板，那算命先生可能真有点道行。昨天说你运道在北，今天就带我们北上深圳，说不准是财星高照，好运当头。我们也沾点运气。”

方辛哈哈一笑：“你在英国读了几年大学，也相信这些胡说八道？”

“世间万物都在可信与不信之间，人类对宇宙的认识是有限的，冥冥之中可能真有天意。一场“文化大革命”把大陆搞得乱七八糟，是人意还是天意？老板，你说得清楚吗？”

凌娜口没遮拦，问得方辛无话可答，谁能说得清那场浩劫是天意还是人意。

凌娜笑着问杨飞翔：“杨经理，今天人中龙出海，怎么没有风雨？”

“风雨在后头呢。老板这次到深圳，龙腾虎跃，耕云播雨，肯定会给小深圳带来一番风雨，你们就等着瞧吧，好戏还在后头。”

“可不要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遭犬欺。”曾国平读过《千家诗》、《增广贤文》、《幼学故事琼林》，自然有学问，很诗人地说了两句。

杨飞翔一听就笑：“平哥，你肚里也有几个词了？真看不出来，还龙游浅水。你知道深圳这地方水深水浅？”

杨飞翔笑着一开口，曾国平就收声了。要说讲古论今，论人断世，十个曾国平也讲不过这个四眼佬。你曾国平这点水平，就别在杨先生面前念《增广贤文》了。

2

凌娜小姐身段苗条，明目皓齿，皮肤白嫩得好像风一吹就会吹破。不论从哪方面看，凌娜小姐都算是美人。

凌娜小姐出生在香港一个殷实人家。父亲凌永坚是香港一家公司的老板，有一幢花园别墅。在香港地，有花园别墅算很有身份的人家了。

父亲是古典音乐发烧友，拥有一会很高档的音响器材和近千张黑胶唱

片，都是世界名曲，都是名厂版本。他花了重资，请了声学方面的专家，装修了一间很讲究的听音室。

除了处理一些商务上的事情，就在听音室欣赏音乐。音响一开，凌永坚就陶醉在音乐大师们的乐韵之中。一切世俗的喧嚣、商界的争斗，都变成朝露碎珠，流云逝水，在清雅、优美、哀婉、雄奇的音乐声中消散飘走。

这发烧友烧的热度相当之高，在公司办公室，也安置了一套不错的音响器材，商谈业务，接待客人，也在轻柔的音乐声中进行。

这位资深的音乐发烧友常跟人说，人生百岁，富贵荣华，也不过是浮云一朵，逝水一勺。只有音乐能使人进入化境，步入永恒。不懂音乐只会在商场宦海里爬来爬去的人，虽然能得意于一时，也活得太苦太累，不懂人生。

凌永坚给朋友送礼，也很别致。他做了一些很特别的礼品盒，录几盒高质量的音乐磁带，签上他的大名，放进礼品盒，作为雅礼，郑重地送给他看得上眼的朋友。

人家看着这精致的包装，以为凌老板如此郑重其事，送的不是金牛玉马，也是奇珍异品。一看是几盒磁带，都忍俊不禁，“凌老板送礼得个响”，已成为朋友的笑谈。熟悉凌永坚的人说，按凌永坚的资历、家世和经商才能，足以成为豪富，就因为音乐发烧把财气烧走了。

凌永坚很疼爱这个宝贝女儿，一门心思希望女儿将来成为钢琴家。当然不可能成为阿格丽姬那样名满天下的人物。曾经是香港人妻子的阿根廷钢琴家阿格丽姬是世界上少见的天才。这样的天才与生俱来，是学不来的。

父亲在女儿身上用尽了心思，给爱女买了一台名琴，专门辟了一间琴室，请了很有经验的钢琴教师教她习琴。希望女儿在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肖邦、德彪西这些音乐天才的乐韵中陶冶性情，开发智力，培育乐思。女儿就是成不了钢琴家，也会长得文雅聪明些。

女儿五岁，凌永坚就要她习琴了。他真希望将来有一天，能看到女儿穿着长裙，高贵地出现在音乐舞台上，运指如神开她的独奏音乐会。那是何等值得骄傲何等令人快慰的事。

这音乐发烧友也是烧过了头。女儿根本不是这方面的料。凌娜坐不住琴凳，对五线谱毫无兴趣，一上琴台就哭。这孩子调皮得甚至敢跟男孩子打架。

钢琴教师对凌娜毫无办法。知道这孩子不堪造就，只好对凌永坚直言：这孩子缺乏音乐天资，难于造就。凌先生，真正的文学艺术，不是光靠技术可以造就，要讲天赋。

这孩子不肯学琴也就罢了，免得误她一生。

父亲只好喟然长叹：这孩子不像大户人家的千金。没有文气，只有淘气，将来也是劳碌命。后来送女儿到英国上大学。这凌娜也怪，女孩儿家学的是男孩学的船舶专业。

学完回到香港，也不跟家里商量，自己到大华轮船公司做了文员。

当凌娜把这事告诉父亲时，凌永坚生气了。香港的公司多得很，找工作也跟我打声招呼嘛！大华公司是养懒人的地方，这共产党的公司“左”得很。怎么要去那儿？

凌娜说：我就想到这家公司做一做，看看大陆人怎样行船。爸，你以为大陆永远会这样？我就不信。总有一天会开放。将来世界最大的市场大概还是在大陆。你信不信？再说，在香港地打工，自由得很，东家不打打西家。

我自己喜欢，你急什么呀？

凌永坚对女儿的独断独行虽然有点不高兴，也弄不清女儿为什么有这个怪念头。但态度还是通达的。让她去闯吧。在大华公司干得不高兴，随时可以跳槽。

凌永坚也不希望自己创立的公司变成家族式的产业。中国有句古话：“君子之泽，三代而竭”。香港地那些家族式管理的企业，他看得多了，经营状况都一代不如一代，到第三代就式微了，这也是定数。

后来，听女儿说，大华公司换马了，来了两位深圳人抓桩（主事），有大干一番的打算。凌永坚听了也高兴。他喜欢看看书报，知道大陆现在是邓小平主政，风向变了。

知道女儿要跟老总到深圳找地盘发展业务，想搞工业发展区。他有点意外也有点高兴。大陆这条大龙真的舞动起来，那可不得了。

凌娜临行前一晚，父亲郑重地跟她谈了话，第一次说起家世。

父亲说，凌家祖居深圳。祖上是宝安地区很有脸面的显赫人家。祖父早年跟孙中山过从甚密，支持辛亥革命。在孙中山手下做过事，跟共产党也有联系。那时蒋介石还是上海滩的小流氓，后来投机革命，在广州起家，掌握了兵权，就露出流氓本相，专制独裁，大刮民财，心狠手辣，残酷地屠杀共产党人。你祖父看不得这种独夫民贼行径，不再跟蒋记政权同流合污，便举家迁往南洋。

父亲叮嘱她：深圳笔架山那儿还有凌家太公的坟地。如果方便，就去太公的坟地烧烧香，叩叩头，清除一下杂草，也算尽点孝心。

父亲说到这儿，声音转缓，很动了感情。父亲为人精细，画好祖上的坟地位置图，让她带着上路。

望着父亲凝重的表情。凌娜才知道老家在深圳。深圳基本上是客家人聚居之地，人们习惯把深圳人叫做宝安客。难怪爸爸妈妈在家里常常说几句客家话。

凌娜觉得奇怪：父亲出生于深圳，却从来不提深圳，没有回过家乡。深圳跟香港只是一河之隔，到深圳不过半天时间，再忙也不在乎这一天半天。父亲到过外国许多地方，就是不到大陆和台湾。不去台湾也罢了，可深圳是他故乡。是不是大陆有什么事伤了他的心，才使他与家乡咫尺天涯？

凌娜几次张口想问，但父亲从小教育她：女孩子要多做事，少开口。大人讲话别插嘴，不该讲的事情别讲，不该问的事少问。这才是有教养人家出身的小姐。凌娜也就没敢问。

曾国平跟凌娜是中学时的同学，现在又在一个写字楼当差，俩人的关系自然极好。

一路上，曾国平好像是凌娜雇用的忠实保镖。这小哥哥绝对是凌娜一打拍子就跳舞、一吹哨子就起跑的可爱角色。

曾国平长得眉精眼利，不论从哪方面看，曾先生都是一表人才。如果家底好，也是打通街的人物。曾国平极喜欢凌娜。有时看着凌娜浅浅的笑涡，听着她迷人的笑声，就会血流加快。曾国平多次转弯抹角地对凌娜表示过爱慕之情，发梦也想拥有这如花美眷。

凌娜对曾国平却说不上亲爱也说不上冷淡。凌娜有时像和熙的春风，使曾国平心里泛进春潮；有时像一尊冷面观音，令曾国平不得要领。

在凌娜心目中，曾国平顶多是追求她的男人队列中后排一个士兵。一

道留学英国的一位同学，追了她两年，她还没有点头。你一场电影就想“埋单”（入账），也未免太天真了吧？平哥！不过，凌娜尊重曾国平这种感情。哪个女孩子不喜欢男人的爱慕男人的殷勤？这种人越多，越能体现自身价值。

曾国平有时摸心自忖：觉得以自己的平民家世，很难高攀这高傲的千金。曾国平一百次对自己发管：别打凌娜的主意了。三只脚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女人到处有。人生天地间，云来鹤去。大丈夫何患无妻！不论他心里怎么发誓，一看见凌娜，就觉得眼前以来一朵祥云，金光灿烂，两条腿也像不是自己的了。

曾国平今天来深圳的心情跟凌娜不一样。深圳也是曾国平的故乡，是他幼年时留下悲苦的地方。

土改那年，曾国平才两岁，父亲因为解放前当过小村长之类的角色被抓了起来，后来糊里糊涂地死在关押的地方。母亲抹着眼泪，带着他到了香港。那时从深圳到香港很容易。现在香港有些地方还是深圳农民的耕地，深圳人叫插花地。深圳农民早出晚归，过境耕作，去香港就像上街。

母亲一副担子，两个箩筐，一头挑着曾国平，一头挑着细软和菜蔬，像菜农一样把曾国平挑到香港。

曾国平母子到了香港后，房无一间，瓦无一片，开头的日子很艰难。母亲没有多少文化，只能在街边卖杂货当“走鬼”。香港的皇家警察恶得像条狼。“走鬼”难当，一听说有警察来就赶快收摊，做贼似的，整天担惊受怕。

曾国平小时候家穷，看见母亲那么辛苦，便到报馆拿报纸当报童，当面包仔。

那年头当报童当面包仔也不容易，也得讲地头，不能捞过界。有一次，曾国平过了界，被那边地头的面包仔打了一顿，面包箱子打翻了，报纸也抢走了。曾国平一泡眼泪，哭着回家。妈看着儿子哀哀地哭，也心里发酸，直掉眼泪。

妈说：“阿仔，都怨阿妈命贱。别卖报纸面包了。我们是穷人，恶不过人家。你别走东走西了。阿妈到玩具厂拿点纸盒回来做。就在家糊纸盒吧。”

曾国平就糊纸盒。有时赶工赶到三更半夜，就伏在纸盒上睡着了。糊一天纸盒也赚不了几个钱。曾国平自小受到凌辱，知道生活的艰辛，懂得银纸的可爱。

历尽生活的艰辛，曾国平发梦也想着将来的交上好运，发点小财。希望将来有间属于自己的房子，有间“士多”店，也就是卖货档口，做点小生意，俩母子的日子过得顺一些。曾国平的人生理想也不过如此。

后来，母亲认识了一位在九龙塘开茶楼的深圳叔公，老叔公可怜这孤儿寡母，让她到茶楼坐台收银，算有了正当职业，日子好过一些，曾国平才有钱上学。母亲知慳识俭，积了钱搞了间杂货店当了小老板，广结人缘，生意做得顺手，总算混得个小康人家。曾国平懂得这世界要捞要搏，要混出个人样，就得勤奋读书。曾国平是聪明仔，一路读到大学毕业。母亲没有再嫁人，就守着这宝贝儿子过日子。

曾国平是个孝子，知道母亲把他扶养成人不容易。赚的钱都交给母亲，很少自己挥霍。有些同事有了钱，就去蒸汽指压桑拿，去玩女人。曾国平还是一个处男。有的同事笑曾国平是“铁公鸡”、“孤寒种”，说他长到这么大，

还不知什么是女人香，也是半个傻仔。

曾国平不理睬这些讥笑。他没有钱也不想嫖女人。

公司的同事虽然常常拿曾国平取笑，说他是大傻。不过，讲技术，论业务，曾国平算个强手。杨飞翔经理看得起曾国平，说他做事扎实，不像那些“花领仔”，讲得多，做得少。

这次，曾国平一说来深圳考察，母亲一听就恼：

“深圳那鬼地方有什么看头！你爹连个坟头都没有。你去那里是哭爹还是哭爷？我早就叫你赶快辞工，别在大华公司干了，你死都不听！香港地的公司多如牛毛，你一肚文墨，哪儿不好干，偏偏去共产党的公司干。也不知你发了什么昏出了那条线！”

曾国平任凭母亲骂，从不还口。他到大华公司不是对大陆有什么感情，是图个自在，能腾出手来再揽一份散工，多搏一份银纸。

这世界图什么？不就是图个钱么。香港地不讲“前途”，只讲“图钱”。香港人常说：有钱有世界，无钱街边仔。这就是OK香港。

曾国平今天是带着复杂的心情过罗湖桥的。虽然有凌娜在身边笑着说笑着，想起当年母亲把他装进箩筐挑到香港的情景，不禁心头百味，无论如何说不上愉快。

3

同行几个人，最活跃最能言善辩的是四眼佬杨飞翔了。这是个鬼马天才，不可多得的人物。

杨飞翔经理祖籍佛山南海，出生于广州东山。过去，广州人常说“东山少爷”、“西关小姐”。广州东山多仕宦人家，从前清遗老到民国官僚，这些老爷少爷多数居住东山。西关多富商巨贾。有钱商家到处选美，金屋藏娇，三房四奶，花天酒地。西关的小姐少奶们营养丰富，自然长得特别粉嫩，打扮得特别娇贵。西关、东山，一富一贵，操纵着广州的政治经济命脉。当年雄极一时的广东军阀陈济棠，就居住在东山地段的梅花村。

杨飞翔祖上也是达官显贵，到他父亲一代已经没落了。不过，烂船也有几斤钉，过日子读书的钱还是有的。杨飞翔家住东山龟岗，就读于东山培正中学。

当时广州有两家中学最为著名，一家是清朝大臣张之洞首创的广雅中学，百年书院，年岁久远，师资雄厚，是广州的头牌中学。另一家是美国佬办的东山培正中学，以英语教学见长。有些外国鬼佬在这儿培训官僚子弟。培正中学出来的中学生，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毕业后可以免试直接进入美国大学。

美国佬在世界各地网罗人才这一手战略厉害，从中学就开始了。

杨飞翔的近房叔父杨伯仁是美国留学归来的医生，有名的“广东一把刀”。有一次杨飞翔到他家，杨伯仁在跟极要好的朋友喝酒。杨伯仁多喝了几杯，大发感慨：“美国能成为世界强国，关键一着就是网罗人才。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攻占柏林，土头土脑的苏联人忙着抢机器搬设备。美国佬不像苏联人那样抢破铜烂铁，他们也抢，忙着抢人才。把德国各方面的尖端人才网罗到美国。事实证明，美国人比苏联人棋高一着，看得更远，也就难怪美国佬称王称霸了。”

那朋友多喝了几杯，也口水花花：“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智商就比斯大林

高几个档次。

罗斯福和斯大林都是大政治家。罗斯福智商之所以比斯大林高，是罗斯福有个不被人称为主义的主义——提出要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这对人类文明是个大贡献。斯大林则醉心于制造恐惧，制造恐怖，靠独裁靠杀人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这就有文野粗鄙之分。”

杨伯仁把一杯酒倒进嘴里，肯定地说：“免于恐惧是当今世界文明的一大潮流。凡是靠制造恐惧建立起来的权威，都是沙滩上的沙丘，风一吹就散。这种人都是世界文明的破坏者，都会在历史上留下恶名。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那是解放前夕，杨飞翔还是中学生，听得有点糊涂。不过，老叔的酒后之言，他现在还记得，也不知是高见还是低见。

杨飞翔中学未毕业，广州解放，美国佬从大陆滚蛋。美国是去不成了。他后来毕业于华南工学院，分配到广州文德北路那家中学当数理化老师，从事粉笔生涯。学校旁边就是广东省作家协会。杨飞翔喜欢交游也喜欢文学，有时到作家协会串串门，交交朋友。

后来，阶级斗争越抓越紧，学生难教了。毛泽东主席有关文艺界的两个严厉批示下达，痛斥文化界，又是“帝王将相部”，又是“裴多菲俱乐部”，而且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很吓人的。作家协会才子们没了神气，人心惶惶，有点像发瘟鸡。杨飞翔预感到中国又要运动群众收拾文化人了。大陆文化人难当，有什么风吹草动，总先拿文化人祭刀。这是常识了。解放后发明了一个“皮毛论”，给知识分子定位为毛。文化人好像是头发胡子，要刮就刮，要剃就剃。教师也是文化人，运动来运动去，杨飞翔也看怕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赶快申请出港。他有充足的理由申请去香港——祖母在香港。

也算杨飞翔命大福大，文化革命爆发前两个月，拿到了赴港签证。再迟一步，这位喜欢到作家协会“黑窝”串门，又喜欢议论时政的杨飞翔先生就在劫难逃，当“牛鬼蛇神”绝对没有问题，戴高帽挂砖头跪煤渣进牛棚也就必然的了。

杨飞翔今年四十出头了。开过公司，当过小老板。碰上那年经济衰退，生意砸了锅，一霎眼血本无归。杨飞翔服了，知道自己不是做生意发财的料，只好认命。命里没有财星，就是翻天碌地也发不了财。弄不好还会倾家荡产。香港地有些商家经常命垂一线，公司破产无钱还债，只好跳楼以死清账。杨飞翔可不想跳楼，他分分钟都希望自己一生平安，大吉利是，长命百岁。

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杨飞翔到大华公司当了高级文员。大华公司虽然是共产党办的，高层都是大陆的外派干部。这公司办得实在不怎么样，对大陆外派干部管得很死。不过，对香港雇员比较宽松。在这公司做事清闲，还能做点私货，待遇也不算薄，也就得其所哉。

这些年来，由于业务关系，杨飞翔跟船飘洋过海，到过许多国家，领略过异域奇情，见过人妖生番，睡过白妹黑妹，见过“大蛇屙屎”，也算个人物了。

杨飞翔兴趣广泛，懂得一点琴棋书画，又会赌鬼赌马，还有藏书爱好，喜欢读点杂书。经史子集，天文地理，诸子百家，风水手相，古典传奇，八卦周刊，咸湿杂志……他都看过一些，肚子里就塞满用不完的学问。香港地书店书摊，什么书没有？中国的《庄子》、《离骚》，西洋的“肉弹笼女”，应

有尽有。

杨飞翔脑子里也是药材铺大排档。既有经典文章，陈皮甘草，也有马经狗经，咸湿故事。有人说杨先生博学高材，是谋略之士；有人笑他一肚湑水，是坏鬼书生。

杨经理特别喜欢跟凌娜说话，喜欢这纯真女子听人说话时的专注表情。不论是好色之徒还是高贤雅士，有漂亮的女孩子专心地当你的听众，总是赏心悦目神清气爽之事。

凌娜也喜欢听杨经理吹牛放炮，他能把成鱼说得翻生。不论他说的是真是假，光欣赏他说话时生动的表情和声调，就足于消除旅途疲劳。

一路同行，凌娜看见身边的杨飞翔揣揣眼镜，就知道他要开讲了。

杨先生未开声凌娜就想笑。不知杨先生要讲“大话西游”还是演义“三国”？

杨飞翔经理从眼镜边上扫了凌娜一圈，开始“演义”了。

“凌娜，你那么漂亮又那么聪明，知不知道香港地开埠于何时？”

原来杨经理要“演义”香港。这倒把凌娜问住了。凌娜出生于香港，留学外国，真没有想过这脚趾下的事情。

“看，问住了吧！小姐，告诉你吧。香港开埠于一八四二年，到今天已有一百多年了。那时香港地荒凉得很，鬼都没几个。香港真正发达起来，也就是这二三十年的事。

老板，没有说错吧？”

方辛知道杨飞翔吹起来没个完，笑笑，懒得理他。

“小姐，我再考考你：香港最早是什么人开发的？”

“还用问？当然是广东人。香港本来是广东地盘，谁不知道！”

“小姐，你说得太笼统。广东四条水路三种人，东江客家佬，西江广府人，韩江潮州佬，海南岛也属于广东。海南佬讲崖话，叫‘海南堆’。我问你，香港早先是广东哪路人开发的？讲呀。”

这可把凌娜问信了。这广东人也够杂的，那么多品种。

“你看，香港人不知香港事。平哥，你讲讲。不知道？嗨！你们真是枉读诗书枉少年了，对香港历史一无所知。告诉你们吧，香港最早是客家人开发的。信不信？”

“讲鬼话。不信。”凌娜笑了起来。

“小姐，我不是空口白话，有史料依据，有古迹为证。沙田的曾氏大屋，元朗的‘潘屋’，还有许多客家人的古迹，看过没有？十八世纪，客家人就是香港的主人了。

那时香港除了荒山就是咸水，荒凉得很。客家人是天生的开荒牛，哪儿困难哪儿去，哪儿艰苦哪安家。他们在香港地创家立业时，广州人还不知这咸湿地是块风水宝地，更别说英国佬外江佬了。老板，我没有说错吧？”

“有此一说。”

“那就怪了。香港的口语为何是广府话，不是客家话？”

“小姐，什么叫后来居上？这就是后来居上。妹仔大过主人婆，这种事多了。客家人多数是山野之民，怎么搞得过财雄势大的广州帮？广府人在南方占尽天时地利，他们一来，客家人就靠边站了。香港的口语也就顺理成章变成白话、广府话，不是‘涯兜’、‘屙里肚’（客家话）了。你笑！过去人家常说‘广州老豆（父亲）香港仔（儿子）’。

平哥，你那么大学问，这意思懂未？”

曾国平笑着问：“杨头，有没有人说广州老母（母亲）香港囡（女儿）？”

“没有这样叫的。老母是随便叫的吗？正傻仔！”

凌娜笑得弯了腰。凌娜一笑，杨飞翔的话更是喷礴而出：

“早先，香港这小地方根本无法跟广州比！那时香港算什么？扯旗山，香港地，咸水妹，番鬼佬，那海岛滩涂不过是晒咸鱼贩鸦片洗黑钱的地方。小姐，你现在住的地方为什么叫铜锣湾？那是当年晒盐晒咸鱼的地方。那时没有电话，没有广播，有专人司锣。

天要下雨了，就拼命敲铜锣，当，当，当，铜锣一敲，就是通知大家赶快收盐收成鱼。

你笑！”

“杨经理，你不是讲鬼话吧？”

“不是骗你，确实是这样。不信，你问问老板。老板是真正的香港通。小姐，如果你是那时的香港妹，也是晒咸鱼的妹仔，哪有今天这样光鲜——手上臭美茄，身上白金链，巴黎时装，意大利皮鞋。那时的香港妹赤脚行田。那时的时装是大衿衫，三裁两剪一幅布，衫领都没有。要身材没身材，要模样没模样，哪来花式皮带胸针领结？一个布条或者扎根草绳就是腰带，就是香港妹。平哥，你笑什么？如果是那阵时，你这‘大碌竹’（大竹筒）也是站在海边打铜锣的角色，哪像今天吹个头发都讲究什么大波细波，穿条底裤也讲名牌。你这名牌底裤再名牌穿给谁看……”说到这儿，杨飞翔赶快收声。

小姐在身边，说到内裤就不能再往下说了，再说下去就有辱斯文有伤大雅了。

曾国平一听心里冒火。又不好发作。便说：

“杨头，人家叫你咸湿佬，没有说错。你除了底裤，就不能说点别的吗？”

这话一出，方辛也笑了起来。曾国平这小子也厉害，一语双关。香港人说“除了底裤”，就是叫你“脱了内裤”。想想，文质彬彬的杨先生脱了内裤是什么鬼样子？看见凌娜还捂着嘴笑，曾国平就像报了仇。

杨飞翔也不好再争论，很有风度地转了话题：“少说废话。再跟你们说说广州吧。

凌娜，你不知道过去广州多繁华多气派！给你讲点历史吧。中国几千年，三皇五帝夏商周，唐宋元明清，广州都是中国的外贸中心。”

曾国平再报一箭之仇：“杨头，还学问家一样。三皇五帝的时候有船吗？还外贸！”

收声吧，说出来不怕笑死人。”

“好，算你聪明。不过，广州是古代全国外贸中心，是不争事实。平哥，对中国历史，你懂得多少？三国时期，广东就是发达的‘南海丝绸之路’。现在言必称盛唐，其实，宋朝的商品经济比唐朝发达得多。广东的经济在宋代发展到高潮，比欧洲发达多了。

美国佬更不值一提。那时美国佬还是土著生番。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跟广州怎么比！

老板，是不是？”

“你吹你的，问我干嘛？”方辛笑。

出生在广州的杨飞翔，显然有广州情结，说起广州就眉飞色舞：

“不是吹牛，南宋时期，南方的经济远远超过了北方，古书上说：‘国家

根本，仰给东南。’这意思懂么？就是说，那时中国经济主要靠南方，尤其是广东。告诉你们吧，鸦片战争以前，广州，有时也叫番禺，不仅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大城市，还是亚洲最大的国际贸易市场。名符其实的一哥，龙头老大。那时，珠江河口，真像书上说的，万船汇聚，大舶参天，物埠丰华，车水马龙。知道这一点，就知道为什么自古以来，广东人是商战高手。阿爷教下来的。广东多水，水为财。广东人扎条水带走江湖，走到哪儿都聚财，这就是广东人，就是历史，就是人文地理。但不懂？”

凌娜说：“杨经理，别吹牛。上海就比广州大。亚洲最大的国际市场是上海，你以为我不知道？”

“小姐，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告诉你吧，上海发起来，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事。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打输了，清朝被逼开放口岸，五口通商。过了十多年，上海才威水起来，成了一哥。这也叫后来居上。广州只好委屈一点，当个老二吧。不过广州资格老，家底厚，除了广州，还有南洋，到处有广东的侨商。广东人的经济实力，中国任何地方都没法比。当然，上海江浙人也是商战高手。中国的商战，基本上是这两家的天下。老板，我没有说错吧？”

“别吹过头了。你忘了唐代西域有一条世界闻名的丝绸之路。”方辛说。

“那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怎么能跟广州相比？小姐，要说对外开放，广州的历史最久，搞得最活。广州那条小街十三行，听过没有？以前就是世界闻名的全国对外贸易中心。那时也叫‘番馆’，被人称为南方的华尔街。为什么广东人最少保守思想，为什么广东人的开放意识变革精神全国第一？稍懂历史的人都知道，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历史人文地理环境形成的。为什么康梁变法、辛亥革命都是广东人搞起来的？道理就在这儿。懂不懂？”

“还有太平天国，洪秀全。”曾国平插了一句。香港仔还知道有个太平天国，就是很有学问了。

“洪秀全？我对这位广东老乡没有好印象。洪秀全搞三搞四，把中国搞得乱七八糟，到头来还是为了自己当皇帝，也是个昏君，腐败分子。别说香港，广东人都懒得提这个人。广东人尊崇的是孙中山。平哥，收声吧。你那点历史知识还是幼儿园水平。”

“杨经理，谈你的广州吧。”凌娜说曾国平，“人家正说得兴头，就你多嘴！”

“好，再说广州，那阵时广州的热闹繁华，你们都没法想象。阔佬大亨，高人雅士，学者名流，三教九流，香客鬼佬……云集广州。香港跟广州简直是蚊臂牛臂——没法比。

直到解放后五十年代中期，还有许多香港人回广州打工。你们眯着眼想一想，就知道那时香港是什么样子。讲到文化，香港这殖民地怎么跟广州比？广州的文化水平一向比香港高，盲公都知道。广州有岭南派三大画家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一代名流。香港有没有？广州有粤剧万能泰斗薛觉先，香港有没有？广东有音乐大师吕文成等四个人，号称‘四大天王’，独树一帜，创立了广东音乐，自成流派。香港有没有——”

“香港也有‘四大天王’，张学友，刘德华……还有天皇歌后徐小凤。广州有没有？怎么不说？”曾国平觉得杨飞翔太嚣张，好像有意贬低香港，立即予以反驳。

杨飞翔一听就笑：“平哥；你水平高，知道香港‘四大天王’。我跟你不是一个档次，好，我不说了，你讲。”

凌娜不高兴了，说曾国平：“人家讲得好好的，你怎么老插嘴？少说两句，人家不会说你是哑仔。杨头，你讲。”

“平哥，不是我说你，你除了知道四大天王，还知道多少？香港仔就这个毛病。出几个流行歌星，以为不得了。这叫什么？叫浅薄。眼下香港流行的东西大体是商业文化，泡沫文化，有些粤语歌连文句都不通，还满世界唱。这些东西有什么文化积累意义？我说的意思你明白吗？老实说，我还真看不起在台上跳上跳下的流行‘天王’，扮野作状，俗得很。凡是流行的东西都是短命的。你们不信我信。”杨飞翔端端眼镜，“要论文化功底，香港人怎么跟广州比？不说别的，广州人起个街名都像样。高第街，状元坊，诗书路，梅花村，豪贤里，文德路。有诗有书，有文有德，名字听起来都响。香港连个地名也起不好，深水埗，弥敦道，油麻地，土瓜湾，盐田仔，鸡公头，街名不像街名，地名不像地名。鸡公头都算地名，脚趾头算不算地名？”

凌娜又笑了起来。

“小姐，告诉你吧。当年到香港谋生的广东人，大多是生活艰难的三乡四邑人家。

广州大佬还真不把小香港放在眼里，称呼香港人也没有好字眼，叫香港仔。香港仔也是香港一个地名。”说到这里，杨飞翔一声慨叹，“不过，这世界，风水轮流转。转眼间十来二十年，香港一个鲤鱼翻身，成了世界瞩目的国际名都，广州一个筋斗跌到底，衰落成这个样子，实在使广州大佬大跌眼镜。大跌眼镜呀，阿哥！”广州仔杨飞翔说到这里，不胜伤感。

“杨头，这也是天意吧？”曾国平问。

“我也说不清是天意还是人意。世事如棋，盛衰有度，人算不如天算。世界潮流不进则退。广州大佬当初发梦也想不到小香港这弹丸之地，经济上会后来居上，把大广州比了下去，恐怕我们的老板也想不到。老板当年打游击打生打死，还不是为了中国发达，哪会想到是这个样子。老板，没有说错吧？”

方辛没有说话。不知道杨飞翔今天哪来这么大谈兴。

“现在香港发达了，神气了，可以倒过来指着广州人叫广州仔了。礼貌一点的叫大陆人‘表叔’。香港仔看见大陆伯，就说‘表叔又来了’。为什么叫‘表叔’？来源于大陆叫烂了的样板戏：‘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香港人讨厌样板戏，就叫广东人‘表叔’，当笑话。有人说，广州的龙脉断了，风水坏了，撞鬼了。广州大佬变成了收买佬，难得来一次香港，一来就捡香港的垃圾货、有些卖垃圾货的小商贩一看见大陆伯，就眉开眼笑：‘表叔又送钱来收垃圾了。’你笑！我听了都伤心呀，阿哥！”

杨飞翔说到这里，本来想收回了，从眼镜边上扫了凌娜一眼，凌娜还在笑。杨飞翔收不住口，再吹：

“省港一家亲。这条歌仔一直唱。如今有了几个钱就看不起人家，不叫阿哥叫表叔，那是势利眼。香港能发达，还不是靠广东人。香港首富就是潮汕人。这些潮汕人好像天生是做生意发财的命。当然，广府人也厉害。广府人在香港时间长，家底厚。大小商家像萝卜那么多。他们不发达谁发达？论总体实力，还是广府人第一。”

凌娜笑道：“怎么不说客家人。客家人不是香港的老祖宗吗？”

“在香港，客家人就没有什么可谈了。打江山和坐江山是两码事。在香港地，客家人为数不少，发大财的不多。多数是湿湿碎的中小商家和打工仔。

小姐，做生意讲和气生财，讲成帮成伙。潮州佬能发达，主要是有团伙精神。潮州人自己也打，不过，一看见有人欺侮潮州人，就一齐动手先打赢别人再自己打。这就是潮州人。客家人有个毛病：黄牛过河各顾各，喜欢窝里斗。别说客家人，世界上，凡是喜欢窝里斗的国家和民族，没有一个会发达。这也是历史。不过，客家人出了个孙中山也就够了。至今台湾人还叫他‘国父’，‘国父’都让客家人当了，还想什么？客家人嘛，就应该客气一点，和气一点，谦虚一点，斯文一点。对吗？”

杨飞翔说到这儿，看见大家在笑。忽然想起方辛也是客家人，便笑着转口：

“其实，客家人是很能干的。你看，我们的老板也是客家人，要文有文，要武有武。

既会做官，又会做大生意，连算命先生也说老板是人中之龙。”

方辛哈哈一笑：“废话。你说我皇帝，也不会加你人工（工资）。”

凌娜笑着接口：“老板，吹牛也要有本钱。杨经理有吹牛的天才，就该给他加人工。”

“那不是变成牛皮公司了？”

凌娜跟杨飞翔开玩笑：“杨头，老板出了个好主意。你就办个吹牛公司，找几个会吹牛的员工，自己当老板吧。”

杨经理哈哈地笑道：“香港地是有不少皮包公司，牛皮公司。香港要注册一个公司，比食生菜还容易。注册一个出版社，也就是几百块港币。你有钱，办十个出版社也可以。

我曾经想搞一个出版公司，叫香港鬼马出版公司。专搞鬼马文化。香港地流行鬼马文化。”

凌娜笑：“你喜欢讲鬼讲马，搞鬼马出版社肯定赚钱。为何不搞？”

“后来想想，又没有意思。小姐，你看，我那么文雅，那么高档，搞那些垃圾传奇，屎坑故事，就眼镜跌落尿缸，不像满腹诗书的杨先生了。”

凌娜笑得喘不过气来。

身边有个吹牛放炮的杨经理，有个保镖般的曾国平，说说笑笑，凌娜一路上也很开心。

就要过罗湖海关了。这时，从香港过深圳的人很少。深圳这乡下地方实在没有什么看头。不像后来香港跟深圳好像成了哥俩好。过深圳的人如过江之鲫。一到节日更是人山人海，忙坏了海关人员。香港人甚至专门到物品丰富便宜的深圳广州采办年货。这是后话了。

第二章 政治边防

1

一到罗湖桥，眼前的景象实在使凌娜不可思议。这就是中国的九龙海关？

泱泱大国的国家海关竟然是木头屋顶的砖房，寒酸落魄。车站边那两排铁皮搭成的窝棚，便是海关关员的宿舍，使人联想到难民营。一条木板搭在深圳河上，桥面上用油漆划了一条粗粗的红线，便是中英分界线。这“桥”没有扶手栏杆，香港小姐眼下时兴穿高跟鞋，凌娜穿着高跟鞋，过桥时提心吊胆，生怕一脚踩偏掉到臭气熏人的小深圳河里。

老天，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罗湖桥？

曾国平不无感慨地跟凌娜说：“你看，共和国的海关这样凄凉破落，还高呼大叫要解放全人类，不是发神经病吧？”

凌娜觉得曾国平说得太损，没有出声。

过了这道桥就是深圳。

眼前是一条布满泥浆的泥巴路，这条土路出乎想象的糟糕。

凌娜小姐叫了一声：“老板，这样的泥巴路怎么走？”

方辛也不禁皱起眉头。

方辛长年在北工作，深圳老家没有亲人，一直没有回过家乡。从北京经广州到香港过罗湖桥，看见罗湖海关如此破落，也觉得共和国的脸皮难看，现在走在回乡路上，想不到迎接他的竟是满路泥泞。

晴天一团火，雨天一脚泥。这就是深圳。就是他的家乡宝安！

几十年过去了，看来状况不比当年在这儿打游击时好多少。中国人的精力和时间不知用到哪儿去了？

在香港，不论你说它是什么主义，你在大马路上走一个星期都不用擦鞋。

方辛看着凌娜脚上的高跟皮鞋，不无苦涩地笑笑：“我早跟你说过，别穿高跟鞋上路，不听。现在国内还没有人穿高跟鞋。深圳这落后的小镇，更不是穿高跟鞋的地方。

你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换鞋。带旅游鞋没有？”

凌娜换鞋的时候，杨飞翔经理目睹此情此景，大发感慨：“老板，我们到这儿开拓业务是否找错了地方？投资环境最基本的是水、电、路吧。连一条像样的马路都没有。

一过海关就像进了烂泥塘。你看过苍蝇，成群结队满天飞。呀——吐……”

好像苍蝇有意封杨飞翔的嘴。他说话时一不小心，一个苍蝇飞进他嘴里。杨飞翔潇洒的表情消失得无影无踪，顿时脸青唇白，赶快吐。杨先生吐完恶心得呕吐起来。

看着杨飞翔狼狈的情形，大家赶快闭嘴，生怕一不小心苍蝇会飞进嘴里。这些香港客第一次领教了深圳苍蝇的厉害。

后来方辛才知道，深圳的苍蝇蚊子之所以出名，是六十年代以后的事——

一九六二年以来，香港的肉食主要靠大陆供应。香港人不缺肉食，但嘴巴刁。吃东西讲味道，不像外国佬，一块牛扒两片面包就是一餐。香港人不喜欢食海外农场的畜产，要吃家养禽畜，尤其是广东的家禽。大陆还没有养鸡场养猪场的概念。三禽六畜出自农家。政府从各地收购运到香港的家养猪，清远鸡，三黄鸡，杏花鸡，龙岗鸡，北京鸭……在香港市场都是名品。香港人就爱吃这些。

国人还勒紧裤带过日子，城镇居民每月也就是可怜巴巴的半斤肉票。大陆除了输出政治口号，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出口换取外汇，就靠从中国人口里挖出来的一些农副产品供应香港同胞。每天从内地运送来准备挨刀子的三禽六畜运到深圳，过海关前经过一番检查。那些瘟鸡死猪跛脚鸭瘸腿鹅在深圳处理掉。深圳笋岗桥下铁路边有一排简陋的房子就是处理这些畜牲的出口处理站。这儿没有合乎规范的卫生处理场所。处理这些死猪瘟鸡烂鸭

的方法也简单：还能吃用的鸡鸭鹅之类内部处理掉或分送给一些机关。

勉强可吃的猪就宰了卖给小镇居民，算是对深圳的特别优惠。

深圳人把这些处理猪肉叫做“傻猪肉”，想买这些傻猪肉也不容易，得有后门还得送点礼品，才能弄到处理站的几斤傻猪肉批条。处理站每天围着许多面带菜色的小镇居民。深圳农民连买傻猪肉也没有资格，只能看着使猪肉发傻。处理站的人可神气了。广东流传一句名言——“广东三件宝，医生司机猪肉佬”。在老百姓眼里，猪肉佬比当官的值钱。

处理站卫生处理的设施很落后，实在不能食用的瘟猪死鸡就扔在一个坑里或者埋掉。

腐烂物越积越多，每天从火车上清理下来许多动物粪便。多年下来，搞得深圳臭气熏天。

苍蝇蚊子大量繁殖，越养越大，越长越凶。街头巷尾，苍蝇像芝麻般撒开。蚊子尤其猖狂，有时白天也一团团在你头顶上飞，追着人咬。

有人因此愤然，说“肥了香港，臭了深圳”。

“哎呀——！”凌娜换鞋时一声惊叫。眼下是阴天，有一团蚊子在她头顶上盘旋，几只英勇的蚊子已经落在她头颈上咬出几个病来。小姐细皮嫩肉又喷着香水，蚊子不咬香喷喷的凌娜小姐还咬谁呢？

“老板，救我！”凌娜被人强奸了似的叫，吓得脸都黄了。

曾国平赶快解开外衣，一边帮凌娜赶蚊子，一边说：“我们不是到了野蛮人居住的原始部落吧！”

方辛听着有点刺耳，也不好说什么，折了一根树枝赶着苍蝇蚊子。心头一阵发紧发酸：我的家乡深圳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方辛正发愁这路不知怎么走。有几位头戴竹笠的农民踩着自行车走来。

“先生，要搭车么？”这些农民看看周围，用宝安客家话问。

别无选择，看来这是惟一的交通工具。深圳这小镇，人口不过两万，不可能有公共汽车，更别说像香港那样招手即停的出租车了。

这些自行车有点特别，是农民创造的特种“客货车”。车架上多焊了两条钢管，后架固定着一块黑乎乎的木板。装猪笼是它，装粪桶是它，载香港客也是它，人畜不分，有什么就载什么。一些自行车在眼前驶过，有的捆着猪笼，载着哇哇叫的猪仔；有的载着从香港过来的旅客。有一辆自行车载着一位涂着口红戴着金耳环金手镯镶着金牙的香港女人，显得特别光辉耀眼也特别滑稽。猪呀，鸭呀，人呀，就靠这些“客货车”开路。

方辛用家乡话跟车夫交谈：“老乡，带我们到县革委会吧。”

“县革委？我们不去。”

“为什么？”

“政府不允许我们搞自发。同志哥，家有老小，日子艰难。我们来这儿搭客，搞点油盐钱过日子。政府不准。批我们‘方向’，说我们搞资本主义。”

方辛一听，哈哈大笑：“这算什么资本主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资本主义？这样的资本主义也太不值钱了！老乡，放心好了，搭我们去吧，不会亏待你们。”

“同志哥，载你们到惠州到东莞都可以，县革委我们不敢去。我们不敢跟官府打交道。你们要我们到那里是捉虫人屁股。到了县府，自行车没收了怎样讲？这是我们的饭碗。你不怕，我怕。同志哥，自己想办法吧。你行你的路，别找我们麻烦。”

他们调转车头要走。方辛叫住他们：“老乡，帮帮我们，送我们一段。不到县革委我们就下车，好么？”

“你们是什么人？”对方很有点警惕。

“我们是做生意的。到县革委办点事。别担心。我们不讲，保证不讲。我也是深圳人，宝安客。自家人还不相信自家人么？”

方辛这一日客家话和诚恳的态度，终于使车夫们觉得可以信赖。他们开出价钱，少得可怜。这份辛苦脚力工，要的钱加起来还不够方辛在茶楼喝一次早茶。方辛心里感叹：这就是我们的客家乡亲，那么穷，又那么忠厚。

车夫催他们赶快上车。他们环视左右，有点紧张地告诉这些香港客；“快！等会儿来了民兵就糟糕。民兵有时来这一带巡逻。遇上脾气坏难讲话的，不单扣自行车罚钱，多讲两句，还打你一顿，专你一顿无产阶级的政。这才叫冤枉呀同志哥！”

方辛听着这些，心里实在不是滋味。“无产阶级专政”也“专政”到农民头上？深圳这地方不是发神经吧？看着车夫如临大敌的样子，方辛招呼同伴赶快上车。

凌娜自小到大，还没乘搭过这样的交通工具。东南亚国家也开始进入高速公路时代。

哪有见过这般难看的交通工具和如此糟糕的路。看着自行车脏乎乎的坐板，对着汗渍斑斑的农民后背，凌娜小姐头皮有点发麻。她会开汽车，不会踩自行车，真不知如何上车。

车夫催促她赶快上车。她刚跨腿，鞋又掉了。凌娜从来没这样狼狈过。曾国平热心地过来帮忙，要抱凌娜小姐上车。凌娜脸一红，将他推开了。方辛过来扶了她一把，让她在自行车后座上坐稳。折腾了一会才定位坐稳。憋得凌娜小姐脸都红了。

方辛无可奈何地笑道：“小姐，到什么地方唱什么歌。委屈一点吧。注意安全，抓紧后架，别栽下来。”

一群农民载着这几位港客，在布满泥泞的土路上稳稳当地前进。

2

县革委会主任到北京参加学习班了。干干瘦瘦的县革委会副主任罗一民主持县三级干部会议。大陆人多、会多、官员多。世界上很有名了。

毛泽东主席以雷霆万钧之势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搞得天翻地覆，天昏地暗。神州大地，战鼓喧天，凯歌高奏。在山呼海啸的万岁声中，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旧的官僚政权已被彻底粉碎，各级政权机关就有了响当当的新招牌——革命委员会。

会议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做好春耕准备工作。快开春了，种子、化肥、劳力……诸如此类一大堆问题。二是如何进一步组织警力和民兵，拦截捉拿非法越境外逃人员，搞好“政治边防”。这一直是县里的中心工作。

过了一条界河就是香港。小小的深圳河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世界分隔开来。

几十年来，县里的主要工作就是如何堵塞外逃分子，建设好“政治边防”。这是很沉重又很难做好的工作。

深圳是个奇怪的地方。罗一民觉得这地方老上演一些闹剧。有些事想起来，至今还心头发憊。

印象最深的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困难的年头。那一次，不知从哪儿传来谣言，说英国女皇发布诰谕：偷渡外逃到香港的人可以立即成为香港的永久居民。谣言像风一样传播，许多人像疯了一样。数不清的人从四面八方涌到深圳。谁也搞不清究竟有多少人。这股外逃风潮像洪水般来势凶猛。人群密密麻麻压在边境线上大冲线。那阵势，谁看到都会头昏脑涨，简直像农民暴动。

饥饿的群众如疾风暴雨，成群结队从界河各处向那边厢逃跑。这边厢各式武装力量都出动了，各种宣传机器都开动了。香港那边也动用了各种警备措施，都无法阻拦洪水般的人流。香港街头一下子涌进数不清的人流，香港大为震动。不少商店关了门。香港人被这洪水般的人流吓得脸都青了。

在香港无亲无故的人在街上转了一两天，发觉不是那么回事。英国女皇没有什么诰谕，香港人也不欢迎他们。到处关门闭户，连一碗开水都喝不上。还不知道厕所在哪儿，就随街屙尿。香港仔如此无礼，尿他娘的香港。有些人到了香港没有着落，一天下来，又渴又饿，像到香港乘了一次墟，饥肠辘辘地回来了。

那些天，罗一民站在广播车上，嗓子都喊哑了。外逃的人差点把广播车推翻，把高音喇叭砸了。后来有关部门说这是反革命事件，抓了一些人。

罗一民觉得这“政治边防”的头儿难当，工作难做。

会议开了两天，重点研究如何加强措施确保“政治边防”。讨论来讨论去，还是老一套路数。大家绞尽脑汁，也苦无良策。大家知道农民苦，心知肚明不敢直说。大家讲的都是些门面话，无非是“警惕”、“保证”之类，越谈越没劲，连公安局长都打瞌睡。

他抓人也抓烦了，抓来抓去大体是一些农民，有的抓了几次还照样跑。如果把这些人一枪崩了也省事，不过是消耗一粒子弹，但对非法外逃人员，上面有一条硬政策——这些人可以拦截，可以抓，可以送去监管所，只是不准开枪杀人。

抓起来的人已经够多了。内线樟木头那儿的监管所建了一处又一处，仍然人满为患。

对待外逃的问题，罗一民的心情常常是复杂矛盾的。

罗一民是宝安人。早年是东江游击队战士，活跃于香港九龙宝安和珠江三角洲一带，复员后一直在县里当干部。县里的主要工作是搞好“政治边防”，把反偷渡外逃当作中心工作来抓。可县里有些村落，几乎整个村的人——包括一些村干部和共产党员——都跑到那边厢去了，只剩下一些走不动的孤寡老人，在门口打苍蝇，看着空落落的简陋泥屋和荒凉的农田。

“十室九空人南遁，家里只剩老和少”——这就是深圳的写照。

贫穷，是可怕的东西。

罗一民内心同情这些非法越境农民。家乡那么穷，三荒四月，许多人家揭不开锅，吃糠啃菜。上面拨下来一些救济，半是番薯半是粮；僧多粥少，解决不了他们的困难。

倒是逃出去的那些人想办法往村里捐钱捐油捐米救济乡亲。他们捐回来的度荒物资不比政府拨下来的少。

经验告诉他，逃出去的人多数是为了活命，为了日子过得好一些，不是去做什么坏事。还没听说宝安人到那边去当美蒋特务。

作为县里主管政法的头儿，不论心里如何打鼓，只能按老皇历办事，

一年年一月月去抓“政治边防”，去抓去管这些偷渡外逃分子。这是从精神到肉体都非常疲劳的工作。

前不久出了件事：一个民兵深夜巡逻，违反规定开枪扫射偷渡分子。据说是喊了几次，他们还逃，就开了枪，把一位外逃的人打死了。罗一民去看了，死者是一个孕妇。

罗一民大怒，当场叫人把这民兵扣押下来。

罗一民看着这一尸两命，心里落泪：当年参加游击队出生入死，不就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么。几十年了，农民的好日子没过上，为了到外面寻找丈夫找一碗饭吃，却陈尸河岸……罗一民觉得这子弹就像射在自己身上，觉得自己手上有血……

这种心境是别人难于理解的。

会开完了。罗一民准备下楼回家吃饭。办公室主任走来汇报：有港商找他。已在会客室等了一会儿了。

“港商？来干什么的？”

“没说。只说跟你是老相识。”

港商，什么港商？怎么会有港商来找他？

经历过“文化革命”年头，港商这字眼比狗屎还臭。好像他们身上有瘟疫会传染给中国官员。前些年，广东“革命政权”在广东大搞“反策反”运动。这古怪名词不知是哪个龟蛋发明的。他们说，香港那些反动家伙在大陆大量发展特务，一封信就可以发展一个特务。革命政权机关对有港澳关系的人发出严重警告：自己身上有屎赶快屙赶快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吓得有港澳关系的广东人屙尿都打冷战，不敢跟香港亲友通信，生怕被打成特务分子。香港那边过来的信件都要经过检查，看看反动的香港人信件中有什么联络暗号。搞得广东人心惶惶，好像广东到处是特务。那时罗一民虽然在牛棚，那种恐怖他是知道的。

港商就是资本家，资本家就是反动派。这是“革命年头”流行的概念和简单的逻辑推理。按照惯例，香港那边来人不能单独接见。罗一民虽然比较通达，但不能违背革命原则。罗一民叫住办公室主任，一道往会客室走来。

罗一民到会客室一看，愣住了——

简易的木头沙发上坐着那人，不就是当年东江游击队的老连长方辛么？

“一民！”西装革履的老连长站起身，热情地伸过手来。

“老首长，是你呀！”罗一民十分高兴又十分意外地迎上前去，伸出双手，紧紧地跟方辛握着。

方辛望着这老部下微笑。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罗一民激动地望着方辛。

“东风呗。”

老连长的样子没有大变，方脸广额，剑眉虎目，额头上那道疤一眼可见。那是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在方辛额角掠过留下的印记。

罗一民疑惑地问：“老首长，你就是他们说的港商？”

“奇怪吗？”方辛笑着问。

“真想不到。我只听人说，“文化革命”中你在北京被关进监狱，整得很苦。”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方辛笑笑，“我改行了，不当官，当商人了。北京派我到香港大华轮船公司当老总。大华公司，知道么？老牌的中资公司。

清朝就有了。”

“听说过。”

罗一民听说过有这个公司。据说是清朝那个卖国贼李鸿章搞什么洋务运动时办的。

几位西装革履的人物，出现在革命政权机关里特别刺眼。这年头，国内还流行着军干装，中山装，多裙子的姑娘都少见，谁敢穿西装？眼前这些人物，除了老连长，其他几位，一看扮相，就知道是资产阶级少爷小姐。

那个留着长头发的后生仔，男不像男，女不像女。“文化革命”一开始就革过这种头发。小将们一看见这种头发就当街上剪刀，见一个抓一个，当街剃头。绝对没有人情讲。

那女人穿的喇叭裤也够呛，也是那革命年头的革命目标，见一个剪一个，抓住你，剪刀一拉，从下面剪到膝盖部位。如果胆敢顽抗，就抓起来打一顿，让你知道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穿着叫什么？罗一民想了一会，才想起来一个名词——“奇装异服”。

对了，奇装异眼！

老连长就领着这样的人做事？他觉得有点不对味。罗一民一句话冲口而出：“老首长，听说这大华公司是卖国贼李鸿章搞的，名声很臭，你怎么跑到那儿干事了？”

方辛哈哈一笑：“什么名声不名声，你对那边的事懂得多少，一时半刻讲不清楚。

反正是我们国家的公司。我为国家打工。明白这点就行了。”

曾国平悄声对杨飞翔说：“你看这土包子。”

“收声！这是人家的地头，你乱吠什么？”杨飞翔觉得这后生仔多嘴，盯了他一眼。

方辛把随同来的几个人介绍给罗一民认识。听见他们叫方辛“老板”，罗一民觉得很刺耳。老板就是资本家。叫人老板等于叫人家是牛鬼蛇神。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叫？老首长怎么变成“老板”了？不可思议。

寒暄过后，罗一民让办公室主任陪着那几位香港客喝茶。他把老连长单独请进一个屋里。大家都是党里人，又是老首长，方辛直入快语：“一民，你是一方父母官，海关出来那条路也得修一修吧。一过海关，就像进了烂泥塘。不但深圳难看，国家的脸面也难看。”

罗一民愁眉苦脸：“老连长，修路要钱。哪儿来钱？你也是深圳人，不知道这儿是贫困县？肚子都塞不饱，过两月就是三荒四月了，缺的口粮还不知到哪儿要，我正发愁哪！哪有闲钱修路？”

看见他一倒就是一肚子苦水，方辛也不好再说什么。

“老连长，你也是。过来给我打个电话嘛。我好派车接你。”

“电话？深圳就两条破街，我还不知哪儿找电话。知道我是怎么来的吗？”

“搭农民的单车来的。大概是这儿的主要交通工具。他们说，单车载客你们也当资本主义抓。”方辛叹了口气，“一民，怎么能这样搞？他们做那份辛苦工，就收那一点脚力钱，这也叫资本主义？有这样出卖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分子吗？在国门口做这蠢事，不怕人笑掉大牙！你这个书记是怎么当的？”

“老连长，一家人不知一家人的苦。你在香港，不知这儿的国情。”罗一民接过方辛的一支烟，“现在还是讲阶级斗争为纲。报纸上整天两个‘凡是’，

讲得我都心烦。

你以为我想这样？老实讲，我不是傻仔，有些事情，我心知肚明，又怎么样。唉，没有办法的事！”

“现在情况变了，三中全会提出要解放思想。一民，不要把什么都当作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东西也不是一一切都坏。起码比封建主义进步一些吧。你应该懂得点历史。像自行车载客这样的事，就不应该抓，应该放。让农民口袋里有几个油盐钱，有什么不好？我看你们思想还没有解放。”

方辛还是老脾气，对老部下不讲客气。

罗一民笑了起来：“老首长，话不能这样讲。老实说，我们的思想够解放了，比三中全会还解放。三中全会公报明确地写着‘不要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我们这儿基本包产到户了。上头还号召学大寨。那玩意越学越糊涂，越学越‘令棍’（客家话：鸡巴），越学越穷。我们早就不学了。还不思想解放？”

方辛一时没有话说。三中全会公报确实有这样的句子，也是时代造成的一点局限吧。

但三中全会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总体精神，看来罗一民还没有真正领会。要让这些县太爷们真正醒悟过来，弄清什么是封建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还需要时间。别说他们，就是有些官居高位整天高呼大叫批判资本主义的人，也弄不清什么是资本主义，搞不清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有何分别。

走了许多国家之后，方辛才看清楚，国内有些人，往往以封建主义的立场批判资本主义；以小农经济的狭隘观念批判当代工业文明。中国封建传统毕竟太强大了。

这些话，现在对老战友无从谈起，说了也等于白说。

方辛吸着烟，感慨万端地说：“一民，解放三十多年了，家乡还这么破落落。我看着都难过。搞成这样子，我们对得起谁？”

这一说，罗一民脸上火辣辣的。方辛大概还不知道他那个大龙公社，那儿除了一些渔民，村民们基本走光了，只剩下几位老弱病残在等着政府的救济粮过日子。要是他回到大龙公社，说不准会哭呢。

3

时已中午。罗一民邀请他们吃饭。县革委食堂没有什么好吃的，罗一民领他们上街。

县革委坐落在蔡屋围，走一小段路就是镇上的小街。

深圳没有像样的酒楼。小街上有几家国营饭店，虽然十分简陋，卫生条件也很差，经营的却是地道的客家菜，特别是狗肉煲远近驰名。

香港不准宰狗，谁敢宰狗谁就触犯大英帝国律令，要重罚甚至判刑。香港的狗死了得按照香港人说的人道主义或狗道主义精神进行处理埋葬。香港人大体是广东籍人士。

吃狗肉是广东人一大爱好。广州佬叫狗肉是香肉。小孩子都会讲：“香肉滚三滚，神仙企唔稳（站不稳）。”广东人吃狗肉是出了名的。

香港地没有狗肉宴。有些香港人为了吃一餐狗肉，天气好时。专门结三拉俩过深圳来吃一顿。这几家小饭店生意也颇为可观。

深圳有狗肉，也是特例。那些年，广东许多地方大搞“打狗运动”，见狗就打。下令禁止农民养狗，搞得农民怨声载道。深圳这地方例外，因为是政治边防，养狗可以防卫，也就有点“特殊政策”。宝安县领导干部比较开明，上头不明禁，就让大家做。所以深圳有狗肉煲。

罗一民知返老连长喜欢吃狗肉，就请他们上一家比较像样的狗肉店。这家饭店选料好，厨师手艺也精良。罗一民招呼贵客一般都在这儿。

饭店门口竖着一块大木牌，上面大书若“香肉”两个大字。木牌上有苍蝇在爬。杨飞翔看见“香肉”两字，就眼睛放光。

饭店负责人看见县太爷驾到，自然是一脸笑容，热情招呼，叫伙计赶快抹台抹凳，斟茶倒水。那时没有三陪小姐，没有卡拉OK，连台布都没有。一个泥制炭炉上面放着狗肉沙煲，炭炉烧得红红旺旺，木炭哗啦地响。虽然四方饭台油腻腻脏乎乎，坐在台边却十分温暖，有一种很土朴的客家情调。

春寒时节，正是打边炉吃狗肉煲的最佳时候。

为了方便说话，罗一民让办公室主任陪那些客人吃饭。把老连长请至一个单独的小间，恭恭敬敬地给老连长敬酒。

酒过三杯，罗一民才知道方辛的来意。

现在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大华轮船公司要开拓市场，扩展业务，要搞码头，要搞配套的工厂，要搞综合开发。方辛这次过来，是看看深圳宝安有没有可以开拓业务的地方。

罗一民一边向狗肉煲里添油添生菜，一边说：“要说土地，这儿有得是。这儿的荒地很多。早年有个说法：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现在社会主义的草多得很。许多村镇的劳动力都走光了，地无人种，田无人耕。很多地方不长社会主义的苗，就长社会主义的草。我们正为此发愁。”

方辛默然。

罗一民跟方辛碰了杯，说：“问题是你们在香港搞的公司算不算社会主义？我心里没谱。一河两界，姓社姓资，阵线分明。人们都这样说这样看。这儿的地能不能给你们开发，我就拿不准了。”

方辛喝着酒，没有答话。

“你刚才说的事儿过去没有过，我们连想也没有想过，太敏感了。你虽然是我的老首长，我也拍不了板，复杂着呢。看来这事要省里或者中央才能拍板。”

“我也知道事情复杂。只是来看看，不是要你拍板，你也拍不了板。”方辛转过话题。“这次是董事长叫我们来，摸清情况好向他汇报。一民，知道我们的公司董事长是谁吗？”

“我们的老团长董子元。想不到吧？”

罗一民愣住了：“老团长不是在北京吗，怎么也跑到香港去了？”

“一言难尽。”

方辛简单地说了老团长的情况。

方辛说，老团长在“文化革命”中吃了大苦头，说他是外国特务，在秦城监狱关了许多年，出来时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说话都困难。养了一年才恢复过来。

罗一民感慨地说：“如果老团长也是特务，中国就没有好人了！”

方辛说，老团长到部里之后，部长是我们的老司令，考虑到我们原来是东江纵队的，香港地头熟，派我们到香港。大华公司现在是老团长当家。

我当他的下手。

罗一民没有想到他尊敬的两位老上级都去香港花花世界当老板了。怎么回事？乘着酒兴，一句话冲口而出：“老团长一世英名。曾经对我们说过，大丈夫应该轰轰烈烈死在战场上。想不到一转身，他也到香港当老板了。”

“一民，这又是一个战场。搞现代工业，不比打仗轻松。”

“不就是办个公司吗？”

“你以为办公司容易呀？”

罗一民不懂这些，殷勤地给老首长斟酒。

“就这样，我们到了香港，成了共产党的资本家——香港人这样说我们。在香港人眼里，我们既是资本家，又是共产党的官员。红的白的全有了。哈哈！”

“共产党的资本家。这名词新鲜。”罗一民听着也笑。

“要不是这些年七搞八搞，大华公司的资产会比现在多几倍，会成为国际大财团。

香港很多大财团就是这十几年间发起来的。这些年，我们净干傻事，以为越穷越革命，真不知哪个王八蛋发明的理论。一民，你以为贫穷就是社会主义？”

这话触动了罗一民的心弦。革命搞了几十年，连老百姓饿饭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这样的革命在他心里也有个大大的疑问。不过，他觉得这是政治家考虑的问题，不是他这个小小的县官说得清楚的。

方辛跟罗一民边吃狗肉边聊天。

“我们现在要抢时间扩展业务。老团长跟我商量，看看能不能在家乡搞个工业区，把钱扔到深圳去。深圳靠近香港，方便操作。你说得对，这儿没有工业基础，困难很多，我们不光是发展业务，还想在国内撕开一个口子，把海外的经验、海外的资本引进来。

这两年，我在海外看得很清楚，世界经济迅速发展，国内的经济一塌糊涂，到了破产边缘。中国如果再像老头子晚年那样整天斗人整人，不发展经济，会亡国的。”

罗一民一听到说“老头子”，吓一大跳。那是天上的神明，人间的北斗，可以议论的么？要是早几年，方辛说这话，要杀头的。他是不是喝多了？

罗一民赶快举杯：“老连长，喝酒！”

方辛手下的人对此行实在不感兴趣。他们弄不清方辛发了什么昏，要到这毫无工业基础的深圳来考察。一路上还高高兴兴，听杨飞翔讲鬼讲马。一到深圳，看见这个情况，就兴致索然了。

自从被苍蝇封口，口若悬河的杨飞翔经理也像发瘟鸡，无精打采，好像被人打了钱包，苦口苦面，话都懒讲。饭店的卫生条件比香港街边的大排档还差。凌娜小姐看着饭店里苍蝇到处飞，坐的条凳好像也有苍蝇屎，头皮发麻。

凌娜问身边的杨飞翔：“杨经理，这地方能吃饭吗？”

杨经理皱着眉头苦笑：“在乡随俗，就随便吧。”

曾国平对这儿的一切都看不上眼，说：“你看，这是人呆的地方吗？想在这儿发展工业，不是撞鬼了吗？方老板不是发了神经病吧？”

凌娜听他这样说方辛，不高兴了：“别牙疼似的，不高兴现在可以回去。跟方老板讲呀！”

杨飞翔也觉得这饭店的卫生条件太差。不过，狗肉一端上来，就觉得这儿可爱了。

一闻到狗肉香味，杨飞翔马上精神焕发，生猛起来。管它能不能在深圳发展业务，光这一使狗肉就不虚此行了。

杨飞翔来了精神，快乐地向煲里添油加生菜，他跟谁都是一混就熟，这时他跟办公室主任好像是多年的老友，称兄道弟。

大家笑了一会，狗肉开锅了。杨飞翔吃得额头出汗，吃得不亦乐乎，吃得眼镜都冒热气，还热情洋溢地动员凌娜吃狗肉，说狗肉养颜，多吃狗肉，特别青春，到美容院花钱不如在这儿吃狗肉。

凌娜不吃狗肉，看都不看，开始看见这脏巴巴的小饭店，一点胃口都没有。可一吃开就吃出味道来。客家有三道招牌菜——酿豆腐。牛肉丸、盐焗鸡。凌娜觉得这酿豆腐和牛肉丸味道还很特别，跟香港的不一样，也许这才是正宗的客家菜。

曾国平虽然在深圳出生，很小就到了香港，不知为何，这客家仔从来不食狗肉，看见就怕。曾国平觉得这种食法实在太野蛮。狗是人们的宠物，通人性的，怎么能忍心把它宰掉？东方人的野蛮文化在狗肉宴上暴露无遗。

曾国平看见杨飞翔张牙舞爪地吃狗肉，吃得满嘴是油，他觉得恶心。放下碗筷，离开餐桌，在破落的小街上随便走走。

这就是他的故乡？这就是他小时被母亲用箩筐挑着逃难的深圳？小街是如此之脏。

有一群小孩子光着屁股露出小鸡巴在街道上打泥巴仗。

深圳镇一条十字街，一眼看到底，没有看得上眼的工商业。转了一圈，只有破破烂烂的农机修理站和修理自行车的小铺子，还有几间不伦不类的商店。街上电线搭得很乱，电线杆子歪歪斜斜。有些电线甚至搭在树杈上，连基本的安全概念都没有。方辛想在这鬼地方搞开发搞工业，简直是昏了头。

大陆有些官僚“左”得太狂，作孽太多了。作孽的结果是带来普遍贫困。这鬼地方大概会永远贫困。看这县太爷土头土脑的样子，就知道不是搞经济的角色。他们不贫困谁贫困？不贫困就没有天理了。他想。

方辛和罗一民喝得有量了，也走到外间。随来的人已经吃完饭，都在饭店外面闲逛。

方辛对凌娜笑笑，问她对客家菜印象如何？

凌娜笑着说：“这小店的厨师还真有两下子，那牛肉丸做得比香港好，吃起来很爽。”

方辛说：“深圳这儿的客家菜是有名的。凌娜，说不准你以后会喜欢这客家地区。”

凌娜嫣然一笑：“老板，我也是客家人，还是深圳人，只是不会讲客家话。你就那么糊涂，没看出来？”

“真的？你是我们的客家妹子？”罗一民看了她一眼，微笑着问。

“骗你们干嘛！我祖父还是孙中山的朋友呢。你们不信？”

“信。当然相信。”方辛高兴地笑了，“凌娜，你不说我真不知道。你看，深圳的客家人很穷，也很纯朴。”

“客家人是纯朴。”凌娜撅起小嘴，“不过，这些苍蝇蚊子可不纯朴，太富于侵略性。老板，别怪我当面给你泼冷水，这地方长苍蝇长蚊子可以，要搞工业开发，恐怕找错了门，异想天开。”

凌娜不但给方辛泼冷水，又冲着罗一民说：“罗主任，你们就没有办法治治这些东西吗？你们当官的可不能只养蚊子不养人。”

凌娜心直口快，这几句话很伤人，说得罗一民脸上有点挂不住。

4

下午。罗一民放下公务，开着吉普车陪方辛去看地头。

罗一民熟悉县里每个角落，都是破破烂烂的样子。“政治边防”，十个村落九个荒，没什么新鲜感。罗一民的感觉已经有点迟钝，有点麻木了。

最使罗一民感到难堪的是深圳罗芳村。罗芳村在香港那边有不少插花地，那些缺水的山田用来种菜种果树能卖上好价钱。这道理傻佬都懂。可是上头指令：农业学大寨，坚持以粮为纲，只准种水稻，不准种别的。这可苦了农民。

刚好那边也有一个罗芳村，是这边跑过那边的人建的村子，好像有意跟这边叫板。

他们种花种菜，饲养五禽六畜，还搞温室栽培，机械操作，穿着皮鞋落田。他们发达啰！

户户光鲜，家家小康，还指着这边做田人的脊背，说深圳人喝了“傻仔水”。

罗一民觉得在这儿当官当得窝囊。他早跟上级反映过，说那边的插花地不宜种水稻，应该按农民的意愿搞多种经营，被上头训了一顿，说他脑子里没有坚决贯彻以粮为纲，反对农业学大寨就是反对革命路线。大帽子一大堆。县太爷连种几亩地的事都管不了，还管个鸟？

罗一民想挪个地方，离开这政治敏感的是非之地。他都想走，方辛却要来深圳搞什么工业区，是不是太天真了？也喝了傻仔水？

罗一民很不理解方辛的想法。这儿连生活用电都难保证，经常开三停两，有时晚上开会，说停电就停电，突然间一团漆黑，马上得点汽灯。镇上家家户户都准备着蜡烛，小油灯，随时停电随时用。这地方搞工业区，是不是发开口梦？

方辛故土重游，看见这一片荒凉的土地，直想掉泪。一晃二十多年，想不到今天还是可怜巴巴的贫困县。

大陆的中国人，干嘛要花死力气自己斗自己！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斗出个一穷二白，斗出个你死我活，斗出个一片凄凉……

不在香港工作，心理反差没有这么强烈。看着这荒山野岭，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方辛感到深深的耻辱。

地老天荒，民穷财尽，冤案如山，人怨沸腾。国家搞得死模死样，如果还不知道这叫耻辱，那真是无可救药了。

车子沿着海湾的地方走，终于来到大龙湾。这是方辛的家乡，他对这儿的一切太熟悉了。

大龙湾的地理位置，像深圳地区伸向大海的一只脚掌，轮廓分明。小小的深圳似乎要伸出脚试探大海的深浅，领略世界的风云。

前面不远就是著名的伶仃洋和伶仃岛。大龙山上有一个可怜巴巴的宋朝末代皇帝的陵墓。这儿又是点燃鸦片战争之火的地方。当年，林则徐指挥的鸦片战争，第一声号炮就是在这山头上打响。山上的古炮台，历经了百年风雨，守望着祖国的南疆。

大龙湾，在海涛的吟啸声中静默着，沉思着。它无声地记载着中华民族历史的屈辱和时代的沧桑。

大龙湾，久违了！

一到这儿，方辛心潮澎湃。解放宝安的第一枪是方辛他们打响的。那时他们已经编入南下大军。老团长董子元带着炮兵团直下宝安。第一仗就是这战略重地大龙湾。蒋家军已经是惊弓之鸟，丧家之犬，兵败如山倒，走的走了，进的逃了，留下的只是残兵败卒。解放军神威所到，收拾这些蒋家败卒没有花太多力气。倒是英国佬要在这地方显威风。这老牌侵略者派出军舰，在大龙湾附近游弋，显示他们的实力。

老团长带着部队来到山头上，看着英国佬的军舰在大龙湾海面上来回巡弋，耀武扬威，勃然大怒：“这是中国的内海，英国佬居然还敢在这儿作威作势！”

董子元向身边的炮兵连长方辛下令：“瞄准英国佬的军舰，开炮！”

方辛有点犹豫：“那是外国军舰。司令部没有下令，好不好开炮？”

老团长血红着眼睛吼道：“英国佬对中国太横行霸道了，这些王八蛋！传令下去，给我打，狠狠地打！”

调整好炮位，一齐向英国佬的军舰开炮。英国佬想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来真格的。

虚张声势回击了一会儿，终于掉头走了。

因为这件事，老团长受到军区司令部的严肃批评，还写了检查。

老团长却笑呵呵地对方辛说：“只要不拿我去枪毙，总算出了这口鸟气。中国人受英国侵略者欺侮已经够了！这群强盗！遗憾是没有打沉他们的军舰。如果打沉他们一艘军舰，就是司令部抓我去坐牢，我也心甘情愿。”

方辛站在大龙湾的土地上，想起当年老团长的话，想起当初向英国军舰开炮的兴奋心情，迎着拂面而来的带着咸腥味的海风，禁不住心如潮涨，血脉喷张。

附近的大龙村，就是生他养他的故土。

“乡亲们都怎么样了？”方辛问罗一民。

“这儿还算好一些。政府允许他们到香港卖鱼。渔业生产还能起作用。不过，也有不少人过那边去了。”

罗一民指指对面。海对面的一抹青山就是香港元朗和流浮山。

方辛叫罗一民开车到海滩去。

罗一民不想让老连长看得太多，有点犹豫地说：“这海湾的路很难走，也很肮脏。

我看就算了吧。”

方辛不说话。

看着方辛坚决的表情，罗一民只好叫司机往海滩开。到海滩没有路，车子颠得很厉害。凌娜被颠得几乎想吐。

方辛隔远就看见海湾。那熟悉的山岭，熟悉的田野，熟悉的蚝房，那蓝天白云，那永远呼啸的海浪……他儿时就在这海边嬉水，在海边长大。啊，故乡！

方辛来到海滩，面色一下子变得铁青。

迎接他们的是洁白沙滩上横陈着多具尸体。有些已经腐烂发臭，有的被苍鹰啄得斑斑驳驳不成人形。

几只苍鹰在海滩的上空盘旋。它们好像瞄准一个目标——沙滩上有一具新陈的女尸，被海水泡涨的肚子很大，衣衫都绽开了……

凌娜哪儿见过这样恐怖的情景。一见这人间惨状，就转过脸去，蹲在地上呕吐起来。

杨经理和曾国平也赶快掏出手巾掩住鼻子。

一团团蚊子从乱草中飞旋而起，像一群群小轰炸机那样在人们的头顶上盘旋。曾国平折了一条树枝忙着给凌娜赶苍蝇。嘟囔着：

“这是魔鬼出人的地方。我们到这儿是活见鬼了。”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方辛颤声地问。

罗一民叹了口气说，这些都是偷渡者的尸体。大龙湾离香港水道近。他们在这儿下水。游不过去的或者被鲨鱼吃掉，或者尸体飘流到这儿。这儿是海湾，海面上许多杂物包括这些尸体自然就在涨潮时流落到这儿。

大海的涛声一波波传来，像叹息，像呜咽，像哭泣。

方辛瞧着那一具具发臭的尸体，瞧着碧波荡漾的海面，泪流满面。

罗一民看着方辛。大吃一惊：“老首长，你是怎么了？”

在罗一民记忆中，方辛是流血不流泪的好汉，在九死一生的战场上也不流泪。

方辛面对沙滩面对苍天大地，面带泪光，哽咽着说：

“我们这些共产党人，愧对人民，愧对青天大地！”

大家黯然神伤。凌娜忍不住哭了起来。

罗一民本来对这些现象已经是麻木了的。听方辛这么一说，心头受到强烈震动，也禁不住有一簇泪花在眼眶里打转。

方辛一抹眼泪，叫罗一民请来几个村民，带着铁锹。方辛和村民一起，将这些同胞的尸体——掩埋在沙滩。

做完这一切，方辛丢下铁锹，表情凝重地看着罗一民：

“我回去跟老团长说，我们的工业开发区就建在这儿！”

第三章 大风起兮

1

董子元从北京秦城监狱出来，好像发了一场梦。

监狱中，长期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董子元声带萎缩了，口齿不清，说话困难。腿肌肉也萎缩了，走几步路就要摔倒。夫人伤心地扶着他一步步走路。五十年学走路，像是笑话。

家在颐和园附近，董子元恢复过来，还没有安排工作，便每天踩自行车到颐和园。

眼前蓝天，绿树，青山，湖水，公园里的一草一木都充满生机，充满诗意。离开蚁穴争荣地，喜结林泉淡泊缘，人生最快慰的事，莫过于与青山为伴，与碧水为邻了。

董子元老家在深圳。早年毕业于陈济棠办的军校。广东西路人陈济棠是著名的军阀，主政广东八年，很为广东做了一些好事。壮观的广州中山纪念堂、中山图书馆、广州市政大楼。横跨两岸的海珠桥、广州第一高楼爱群大厦，都是那时的建筑。陈济棠还重教育，重经济，兴中学，办大学，建工厂，搞医院……那时广东的文化经济的发展是比较好的。广东人对陈济棠的

评价不俗，说广东的历代官僚，贪官污吏居多，尸位素餐者多。

陈济棠倒真为广东做了一点实事。

董子元曾经听家乡人说过一件真实的故事：有一年，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到宝安深圳检查工作，问一位老农民日子过得怎么样。好不好？这位老农民不知道眼前矮胖的湖南佬是省委书记，一句话扔过去：好个屁，现在还不如陈济棠时代。随行的官员听了大惊失色，这等于说陶铸不如一个军阀。这农民实在太反动了。幸好陶铸大人有大量，只是哈哈一笑，没有为难这老农民。

陈济棠的迷信是出了名的。打仗办事，先拜神问卜。广东民间有一个流传甚广的笑话，说陈济棠能在广东坐大，主要是因为有个神仙老婆。老婆有个神仙肚，肚眼里有一撮神仙毛。陈济棠办大事，要打仗，必先净手焚香，让老婆亮出肚皮，拜一拜这撮神仙毛。这撮毛顺当服帖，就做，就打；如果这撮毛凌乱，就洗手收兵。老百姓说得有鼻子有眼，也不知是真是假。民间人士十分惋惜地说，陈济棠所以兵败，是因为举兵前没拜老婆肚脐上那撮神仙毛。举兵时，老婆警告过他：老爷，我烧了三炷香，肚脐毛还乱，万万不可举兵。无奈陈济棠已经跟李宗仁协议好举兵之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老婆再三劝也听不进去，就有了这败局。民间人士慨叹：老婆的神仙肚都不相信，还相信什么呢？陈济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也是个傻仔……

广东人性尚轻灵，不喜欢沉重。往往把政治人物政治事儿当笑话讲，这是广东人的文化传统性格。就是黄钟大吕之声到了广东，也变成广东音乐《沉醉东风》或《饿马摇铃》。

董子元从陈济棠的军校出来，觉得国民党搞得实在不像话，贪官污吏，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董子元认识了一位地下共产党员，看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眼界大开，便投奔共产党，参加游击队。东江游击队是铁血男儿组成的队伍，活跃于粤港等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下大功。后来改编为两广纵队，转战山东。解放两广时作为先遣部队挥师南下，势如破竹。炮兵团长董子元是一员骁将。解放宝安那场仗就是他打头阵。

解放后，董子元当了外交官出使外国。

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董子元被电召回国，一下飞机，就有警车在机场等着他了。

董子元还弄不清怎么回事，就被塞进警车，拉到一个地方关了起来。那是个很小的房间，中间放着床，没有床架，床上一张薄薄的被子，床头一个马桶。四壁茫然。

董子元莫名其妙，搞不清身犯何罪。后来有人提审，喝令他坦白交代罪行，如实招供。否则就死路一条。

董子元说：“我没有什么好招的。”

当头头的说：“看来他饿了，给他吃点早餐！”

他们拿了一把筷子，夹在董子元手指关节里。一条大汉用力一握，董子元顿时额头冒汗，痛得昏了过去，好像手指断了。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到了渣滓洞。

“招不招？”

董子元不说话。问了三声，董子元还是不说话。

那人冷笑：“这家伙也累了，让他躺一会吧。”

董子元被抬到一条板凳上，两腿一绑，往腿下面上砖头。更惨的酷刑，

使董子元几次昏死过去。他觉得好像生活在中世纪。

后来，董子元才知道被莫须有的定名为外国特务。康生下的条子，把许多驻外使节打成特务。这老王八是共产党里的绞肉机。许多党里人早就知道这有着斯文冠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的宠臣是个魔鬼。

一天深夜，两个看守他的人忽然吆喝他起床，他们抛过一件军用雨衣蒙住他的头，把董子元往窗外塞出去。外面两个人像接死尸一样，接过来像扔麻布袋往卡车上扔。董子元以为要拉去秘密枪毙。

车子一直开，开离北京市区。天亮了，允许董子元解开蒙面的雨衣。一看已经过了顺义，见一座大桥，路上标着“秦城”两字。董子元才知道死所未到，不是拉去枪毙，是送他进秦城监狱。

董子元在秦城监狱一关就是许多年。没有人提审，就像一袋垃圾被扔在那儿。董子元后来才知道，如此炮制他，根子还是出在东江游击队。

说起东江游击队，又是一番血泪。“左”道横行，吸血狂魔康生之流大揪“南方叛徒网”，大整广东干部。广东地下党和游击队都入“网中”。活跃于港九珠江三角洲一带的东江游击队自然首当其冲，被打成“反革命别动队”。斗的斗，批的批，关的关，连一世英名的老司令也被抓起来打入大牢，整得死去活来。

董子元在监狱几年，好像被关在一个铁桶里。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准关灯，不知日夜。

董子元除了看蚂蚁爬来爬去，就再不知人间何事了。

董子元从监狱出来，才知道林彪已经灭亡，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政务。

方辛来看他。方辛在文革中也被抓了起来，关在另一家监狱。谈起那时情景，方辛没有长吁短叹，一说就笑：那年头事情多了。你知道我最头痛的事是什么？是没有裤带。

方辛笑着说：监头怕我自杀，一进去就把我裤带没收。我整天要提着裤子，真狼狈。

尤其是早晚提着裤头向毛主席请罪，心惊胆跳。生怕一不小心裤子掉下来，在毛主席像前掉裤子，罪就大了。我跟监头说：裤带还给我吧，如果要自杀，我早就自杀了。没有裤带也可以自杀。你看，我整天提着裤头向毛主席鞠躬，这像什么？是不是有欠恭敬？监头说：我们执行上头的规定。叫你提裤子就提裤子，叫你脱裤子就脱裤子。别再嚣张。

说起这事，俩人都哈哈大笑。

方辛出来的时间早，知道情况多。跟董子元谈起广东。方辛叹气；广东人命苦。解放后没有几天安乐过。‘文革’时期，林彪党羽黄永胜、刘兴元、丁盛这些人掌管广东，真是搞法西斯统治。这样说还轻了，他们比法西斯还法西斯；几乎把所有解放前在广东从事革命工作的烈士、干部、党员都打成“特务”、“叛徒”、“土匪”。广东给他们搞得简直是乌烟瘴气。一声“群众专政”，在广东到处杀人。广州马路的树杆上都吊着死尸，有些地区杀人，杀得河水都染红了。你简直无法相信是真的。

董子元听着毛骨悚然。

董子元想不到中世纪的酷刑居然在广东土地上重演。哀哉广东！

董子元有时夜立楼台，北望南天，真想为广东一哭。

老司令曾广生也从监狱出来了，住在医院。董子元和方辛去看望司令。

老司令也是宝安深圳人，出身富豪之家。他对董子元说过，他参加革

命的起因，不是看了什么马列主义，是看了巴金的长篇小说《家》、《春》、《秋》，很激动，觉得社会太黑暗，太腐败，很压抑，非改变不可。便拉起队伍，组建游击队。后来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加共产党。

司令是当年纵横粤海地区的传奇英雄。蒋介石曾悬赏十万花银要买他的人头。国民党花尽心机，没能伤他一根毛，却被“自己人”打成叛徒扔进监狱，打断了两条肋骨。

一天，他看了鲁迅一篇文章，里面有文字“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革……”他看了半天，觉得鲁迅真是伟人，几句话，就把中国的事情写透了。

司令被关押的时间长，已经失语。能听，不能说话。看着当年的老部下，只是点点头，微微一笑。

董子元和方辛在病榻前握着司令的手，良久无语。

司令在一张纸头上写下两行字他们看——

“鸡犬升天终畜类，麒麟伏地亦雄才。”

董子元和方辛看了半天。此时无声胜有声。司令这两行字，已经尽显将帅襟怀，人心世道。

司令病愈之后，回部里主持工作。听方辛说到董子元还没有安排工作，便把董子元从外交部门调到部里。这时，“四人帮”已经垮台，邓小平再度出山。中国又一次面临转折关头。

广东的形势也面临转机。中央派遣老资格的政治家习仲勋到广东主政。习仲勋行前去见叶帅。叶剑英特别交代习仲勋：广东是“文革”的“重灾区”。到了广东，要妥善解决“文化大革命”以及建国后广东历次政治运动所造成的冤假错案，团结广大干部群众，把广东的工作搞上去，跟上全国的步伐。后来中央又加派杨尚昆到广东任副职。这两位老将，喝够了“文化大革命”的辣汤，深知人间疾苦，到广东半年，就跟广东干部一道，处理了一大堆棘手问题……

2

司令找董子元和方辛谈话。

司令说：“部属的香港大华公司搞得半死不活，非解决不可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干。部党组研究过了，决定你们去掌管香港大华公司。子元当公司董事长，小方当总经理。任命书很快会下达。”

虽然前几天司令跟他们吹过风，但想不到事情这么快就定了。

“你们是广东人，香港地头熟，老关系也多，应该知道怎么干。去到那儿，一切按国际市场规律进行操作，把被动的局面扭转过来。”

说实在话，什么是国际市场规律，方辛和董子元还搞不清楚。在人民共和国的词典上，还没有市场规律这个字眼。

司令几句话如金石掷地：“你们要敢于打破过去的老框框，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到那儿先弄清情况，有什么困难向部里提出来，部里支持你们。”

响鼓不用重锤，老司令画龙点睛几句话，他们心里就有了底。

一纸任命下达，董子元和方辛走马上任了。

在中国，大概没有比大华公司更老的企业了。大华公司贯穿了中国百年的近代史，从公司的荣辱升沉，大体知道中国近代工业的端倪。

一百多年前，一场鸦片战争，外国佬重炮轰开了中华帝国闭关锁国的

大门。门一开，外国轮船长驱直入，垄断了中国的江海航道。插着各色鬼佬旗的洋船，鬼叫般地在中国江海横冲直闯。中国破旧的木帆船哪儿是这些海盗们的对手，一霎时落花流水。中国的航运业眼看就要完蛋了。

神州陆沉，国难当头，满清朝廷矛盾激化，两派势力明争暗斗：一派是守旧派的顽固官僚，一派是洋务派官僚。

顽固守旧派官僚基本上是那些皇亲国戚，三朝阁老，内宦阉公，他们只顾手上的银子，头上的花翎，就是眼看着大清帝国灭亡，也不想有任何变革。改革，对任何抱残守缺的废物官僚，都是痛苦的事。

另一派是洋务派官僚，也是清朝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就是洋务派的首领。

眼看着列强肆虐，国脉微弱，他们“师夷长技”，着手创办近代工交企业。北洋大臣李鸿章不甘心眼睁睁地看着海运沦亡，冲破保守派的重重阻力，奏请同治皇帝恩准，集资招商，创办了实力颇为雄厚的大华轮船公司，总部设在上海。李鸿章这老小子干的坏事不少，这件事却是做对了。

大华公司在列强刀俎下顽强地站立起来，激烈地跟鬼佬争夺航道水域。公司鼎盛时期，雄踞中国江海。飘扬着大清帝国双龙黄旗的大华公司船队冲破波浪，跨海远航，开往日本、美国、英国和东南亚各地。

中国的海员们大海扬波，挽救了行将灭亡的中国航运。大华公司的建立，宣告了中国现代航运业的诞生，标志着大清帝国从闭锁国跨出了开放的第一步……

随着大清帝国的灭亡，改期换代，军阀混战，官僚政权像走马灯换来换去，大华公司几度沉浮。

蒋介石这独裁者控制大华公司，不是为了发展中国经济，是为了维护独裁统治。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物资大部分就是大华公司运输的。大华公司成了蒋介石这“运输大队长”的运输工具。解放前夕，蒋介石眼看大势已去，一声令下，命令上海总公司和各地分公司连同船队转移台湾，命令将不能转移的码头、仓库炸毁。

围绕大华公司，上海、广州等地的地下人民武装报国民党进行激烈的斗争。叶剑英将军挥师南下，香港分公司的船员在广东地下党的策动下，高鸣汽笛，易帜起义，被正式命名为香港大华轮船公司。

解放初期，香港大华公司曾经威风过一阵子，后来“左”道横行，大华公司式微了。

董子元和方辛到香港赴任，大华公司的凋敝景象，超乎他们想象。令人触目神伤。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华公司？他们看着都心里难受。公司搞成这副模样，简直给人民共和国丢脸。

不能怪前任无能。国内的左绳右索，捆得他们动弹不得。在香港人眼里，这家中资公司像个傻鸟，整天愣着头团团转、有生意不会做，好似是越穷越革命，十足是个怪胎。

公司管理松散。方辛巡了一圈，那位被人笑称“坏鬼书生”的杨飞翔，三天没露面了，人们也说不清他去了哪儿。倒是凌娜小姐在忙乎，整理报表，分类归档，做得很认真。方辛在她旁边站了一会，你问什么数字，她不用看都能对答如流。是个人才。

杨飞翔终于来了。方辛找他谈话，说了他几句。杨飞翔有点愕然：“方

老板，你是真干哪？”

“不真干，我来这儿干吗？”

“我以为你们也是来香港叹叹世界。要真干可不能像现在这样干法。得立些规矩。

不过，大陆的条条框框那么多，你想干能干得了吗？”

方辛很客气地征求他的意见，请他谈谈如何加强公司管理。杨飞翔是竹筒脾气，把公司的弊端像竹筒炒豆子般用了出来，还提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又是个人才。

方辛跟董子元商量，应该打破老框框，敢于使用本地雇员。像杨飞翔这样的能人，就可以考虑提为部门经理，不一定都由大陆来的外派人员主管各个部门。

董子元和方辛摸清了情况，召集公司管理人员开会。

新官上任三把火，大家想看看这两个广东佬放什么火？

董子元说了几句简短的开场白：“我知道大家心里屈着一肚子气。今天这个会就叫做放气会。放完气，我们再商量如何鼓气。这个会就这样开，好不好？”

这样开场，大家耳目一新。方辛又说了几句，给董事长的话加点温。气氛活跃了。

越谈越热，会上像煮了一壶开水，人们大吐苦水——

“这算什么公司？只是维持会，看守所。放个屁都要汇报，谈什么发展？”

“全世界也没有这样办公司的。有段时间，我们这些内地派来的人员，什么都要限制。不能跟外面交朋友，不得随便说话。出门也要二人同行。把我们当什么人了？好像我们都是贼！还干个什么鸟！”

“不但思想上限制，业务也管得死死的。业务上的事，不经过北京总公司批准都不能办。几千块钱的开支都要北京同意才行，你说我们还能干什么？”

“有更荒谬的，船舶载什么货物，怎么调度，全部要由北京定。荒唐不荒唐？更别说买船和主动揽业务了。我们连想都不敢想。把我们捆得死死的，谈何发展业务？我们在这儿是当傻仔！”

“搞了几十年，傻仔都发了。说件怪事：早些年，我们小木楼旁边的房主想卖房，我们想买下来。不过是一千平方米的房子，很便宜。我专程去北京跑了几次，都不同意。

我请示的时候，领导说：香港都是我们的，为什么要买呢？好像香港就要解放似的。”

一位部门经理说到这儿，大家都笑了。董子元笑完后，又觉得这笑中有泪。我们的管事人怎么蠢到这个地步。

“就是解放香港，还得讲点政策，不能随便就没收人家的房子吧？不知当头的是怎么想。我一说再说，一求再求，怎么说都说不通。那时地产低潮，如果买下来，现在已经升值几十倍了。没有经济头脑，谈何领导指挥？”

“国内的政策如果松一松，哪怕只松一点点，公司也发了。那些年，香港政局动荡，走佬（走的人）多，地价便宜得很。现在买一幅地的钱，那时可以买十幅了。李嘉诚不愧是李嘉诚，看得高望得远，大手笔！人家忙着卖地，他大量收进。人家发了大财成了巨富，我们却像傻B。眼睁睁地看着人家发财。自己找来衰。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人家一门心思做生意，我们关

起门来学两报一刊社论，学得大家像发瘟鸡。现在四周都横了，发了，就我们像‘乞衣仔’（乞丐）。看着人家，我都不好意思抬头。不是我们没脑。

是上头没脑，也不让我们有脑。公司没有破产就阿弥陀佛了。”

“现在不是磨嘴皮的问题，是让不让我们干。马死落地行，现在马还没死，还有一口气，让它爬起来，路数还是有的。关键是上头放不放权，要搞死还是搞活。老在那儿讨论什么姓社姓资，净讲废话，粥都凉了。没有一点灵活政策，公司是死路一条。我说这些绝不是危言耸听。”

大家把一肚子气放完，也不过图个痛快，说个明白。这两位广东佬能干些什么，大家还得拭目以待。

董子元和方辛对公司管理人员做了适当调整。杨飞翔调任为发展主任。凌娜小姐调总经理室当助理……等等。

杨飞翔知道让他当主任，来劲了。在方辛面前一拍胸脯：“士为知己者死。老板，既然看得起我，我杨飞翔一百多斤肉头，放在哪儿都不会给你们丢脸。”

凌娜后来跟方辛说：“老板，你们再来迟一个月，我就走了。我爸没说错，大华公司是养懒人的地方，是个怪胎。大陆的公司是不是都这样？”

方辛没有回答。

公司领导层经过反复研究，最后董子元拍定，决定采取几条措施搞活公司——

立即起草报告，要部里放权。要求公司有五百万美元以下的财政支出审批权；

鼓励员工特别是管理人员跟香港商界人士广交朋友，多渠道发展业务；

打破所谓“一无外债，二无内债”的小农经济思想。借钱买楼，洗刷公司寒酸落魄的形象。哪个商家不是跟银行滚在一起做生意；

寻找地方，扩展地盘。搞码头，建仓库，搞修船厂。如果在香港买不起地皮，就到深圳找地方发展。

几条措施一宣布，公司有希望了。

国庆节快到了。董子元要搞个大动作：到香港找个星级大酒家搞个盛大宴会，把香港商界有名的大佬（大亨）能请到的都请来，吹点新鲜空气，洗刷一下沉闷局面，让公司亮亮招牌。

公司还很穷。董子元瘦马屙硬屎，出手万金，假座以高消费著名的香格里拉五星级大酒家开国庆招待会。公司员工一听都眼睛发亮，说公司有戏了。

董子元资格老，面子大，也是老香港。萝卜头日本仔投降时，董子元就任东江游击队驻香港的特派员，也算是老行尊了。后来又当外交官，大场面见得多了。开个招待会，对他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

招待会开始了，香港商界巨子霍英东、李嘉诚、庄世平、胡汉辉、冯景禧、胡应湘……都来了。一个公司的招待会有这么多巨头出席，也算是奇闻。香港电视台还来了几条“枪”，在那儿扫来扫去。好大的阵仗！

许多商界巨头出席一个不起眼公司的招待会，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大陆起风了，气候不同了。过去缩头乌龟般的大华公司敢开这样大规模的招待会，必将有大动作。这些商界巨头出席，也说明海外炎黄子孙是如何关心祖国的兴衰，民族的运命。

宴会厅华灯齐开，一片喜气洋洋。

董子元说得动情：“女士们，先生们，大华公司这家百年老店，可以说是中国有史记载的第一个开放的企业。百年沧桑，有过鼎盛时期，也有过困难时代。大华公司搞成这个样子，在下不才，真是无颜见江东父老。这次兄弟下港，中央要我们争取五至八年内把大华公司发展成为一个综合性大企业。任务维艰，不胜惶恐。只有披肝裂胆，鞠躬尽力，以报答国人。”

董子元抱拳向在座来宾一揖：“兄弟一介武夫，受命来公司主事。在诸位面前，可以说是外行。我没有别的本领，一靠中央的支持；二靠员工的努力；三靠在座各位贤达不嫌鄙陋，指点愚顽，鼎力支持，感激不尽。在这儿，请受兄弟一拜！”

真情动人，全场掌声雷动。

酒宴开始，霍英东、李嘉诚等人热情地跟董子元、方辛碰杯，说了一些热情洋溢的话，都希望公司好，大陆好，祖国好……

宴会进行时，有一道很特别的景致——宴会厅灯光骤暗，一阵乐音好像从天际飘来，八音齐奏。一群仙女般的女侍分列两行，手捧一盏盏银灯娉娉婷婷地向客人走来。那情景像进入瑶池仙境。“仙女”们分立在客人面前，俯首弯腰，银盘过顶，银盘上托着一颗蟠桃，蟠桃上亮着明灯，呈献客人。这是“仙女献桃”。礼毕，突然灯光大亮，原来献的是一款蟠桃形状的雪糕，雪糕上还亮着柔和的火焰。手上的灯，头顶的灯，脚灯，壁灯齐开……这一道风景，叫“大放光明”。这些花样，也只有香港人想得出来。吃东西吃好意头，好兆头，一向是广东佬和香港仔的传统习俗。

有位女士走到方辛面前祝酒，女客一身珠光宝气，走路如轻风飘来。她微笑着说：

“方局，还认得我吗？”

方辛一怔，觉得面熟，可一时记不起她的名字，只好展颜一笑。

“我是秦素娟，在部里干过，很早出来了。今晚跟我先生一道来给你们助兴。局座恐怕记不起了。”

方辛想起来了。这是汕头妹。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部里。好像转眼间就不见了。

原来她到了香港。

秦素娟说了丈夫的名字，是香港有点名气的商家，经营百货业，也是潮汕人。

方辛笑道：“你看我这记性。你现在富态了。你不说，我还真认不出来。”

“你贵人事多。我是无名小卒。你还想得起来就不错了。”秦素娟微笑着，跟方辛一碰杯。说了一声“胜”。

方辛高兴，跟她胜（干）了。

“人们常说，人生何处不相逢，这话没错。”方辛笑，“现在应该怎样称呼你呢？叫周太还是周秦素娟女士？”

秦素娟也笑：“局座，在你面前，我是小字辈，哪来这么多客气。叫我小秦。”

“小秦，这儿你地头熟，以后得向你请教。”

“又客气了。局座有用得着的地方，只管吩咐就是了。你的情况我听人说过一些，够艰难的。”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

“方局，恕我说话放肆，大陆是自己搞衰自己。如果我不走，恐怕也难

逃一劫。今天参加你们的招待会，我感觉到大陆的风向变了。照这路数搞下去，很有希望。”

“但愿如此。也应该如此。”

“局座，在香港做生意，你一定要广交朋友，不要缩手缩脚。机遇这东西，说来就来。我出来时，香港的经济比广州还差。大陆只要能稳定下来，多少生意可做！”

见方辛忙，秦素娟递给他一张名片：“方局，有什么事要办，随时打电话给我。”

3

香港的天气变幻无常，说风就风，说雨就雨。

这几天，春冷加上潮湿，像有一股湿漉漉黏糊糊的东西包裹着你，拒之不走，挥之不去。今天，天气回暖，北方的冷空气和太平洋的暖流绞在一起，香港大雾弥天，好像地板也能拧出水来。

这恼人天气，上了年纪又有风湿骨痛的人特别难受，就像有许多小蚂蚁在你关节上咬，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董子元的风湿骨病又发作了。这毛病是秦城监狱留下的后遗症。他最怕这种天气。

关节痛得难受。

董子元处理了几件公务，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转了一圈，舒舒筋骨。司机小魏进来了。

小魏看看他的脸色，问：“董事长，不舒服？”

董子元笑笑：“没事。老毛病了。”

“这样的天气，去不去修船厂？”

“去。”

“得穿件风衣。海边风大。天气预报今天有小雨。”

董子元穿件风衣拎把雨伞下楼。老天爷板着阴沉的脸孔。三日晴两日雨，是香港常有的天气。

不能不佩服香港人对市政的管理。这人口密集的“石屎森林”，喧嚣的都市，管理得有章有序。到处是人流车流，马路很干净，水洗过似的。哪像北京城，王府井，西单，东单，到处有烟头。颐和园的湖面上也泛着混混沌沌的纸屑杂物。

司机小魏打开车上的暖气，董子元觉得舒服一些。要说左道，香港走的真正是左道。

行人、汽车一律左边走。如果按走路分派，香港人是真正的“左派”。

车子一开出大厦林立的街市，进入郊道。看见青的山，绿的树，董子元觉得神清气爽。最近收到部里的正式批复：给予大华公司优惠政策——公司有五百万美元贷款的自主权，公司可以按照国际市场惯例，开展多种经营，无需左请示右请示。批文一下，董子元周身松快，可以施展一番拳脚了。要是按过去那一套，别说他董子元，就是诸葛亮当老板也不行。

前不久，公司买了一幢楼。正重新粉刷装修。公司自筹了一些钱加上银行贷款，几千万一笔就摔了出去。香港的地产还会升值，再过几年，这幢楼的价值可能就过亿了。

车子开到海边，维多利亚港烟波浩森，万船汇聚，气势壮观。十多年，

弹指一挥间，香港成了东方第一大港。弹丸之地创造了世界经济腾飞的奇迹。当年转战香江的董子元，看着脚下这熟悉的土地，像喝了二十四味茶，说不清是哪一味。

来到公司的修船厂，心情一下子沉下去了。一个小修船厂寒酸地蹲在那儿。一廉风雨，几道簿墙，人目凄凉。有一些工人正在那儿操纵着过时的工具修船拆船。周围壮观的建筑咄咄逼人，这窝棚厂简直大煞风景。这小地盘像“三寸金莲”，玩玩可以，走路就难了。修自己公司的旧船破船还忙不过来，别说对外扩展业务了。前几天他和方辛到落马洲那一带考察过，一打听，地价很高。公司就是贴老本也没有那么大本钱买地。看来到深圳选址建区扩大业务已势在必行。

昨天方辛去深圳看地，不知回来没有？

起风了。海边风大，大风夹着雨横面扫来，把司机小魏手持的雨伞都吹翻了。

小魏说：“董事长，猛风斜雨，顶不住。回去吧。”

4

方辛回到香港，不无激动地跟董子元谈了深圳的情况。

董子元听了也很激动，茶杯一顿，愤然站起身：“想不到家乡变成这个样子。阿辛，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忠奸不分，是非不分，草菅人命，视民如草芥！”

方辛说：“下决心到大龙湾干工业区吧。回深圳一趟，我想得很多。在那儿建区，不仅仅是发展业务，我看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我考虑过了，公司的总经理你找别人当，我去建区。我卷起裤脚就是一家人，了无牵挂。有什么三灾六难，我担了。我们就下决心在那儿打它一炮。老团长，下令吧！”

“好，请几个这方面的专家，我们一道去深圳定盘子。”

董子元亲自出马，带着一班人马再到深圳考察。董子元看见深圳破落情景，也禁不住心里发酸。

他们看了几个地方。经过一番比较和专家论证，最后选定大龙湾，下决心建区——建设新中国第一个工业发展区。

方辛意味深长地说：“强风起于青萍之末。老团长，别看建区很小，搞得不好，说不定能牵动全局。就算我们再打一次解放战争吧。只要能为四化作出贡献，把社会主义民主化事业推向前进，纵使粉身碎骨，面对历史，我们也死而无愧！”

董子元站在当年率兵征战之地，对着大海发誓：“我们就在这沙滩陈尸的地方建区。

不管多么困难都干，把我们的身家性命押上去！不改变家乡的面貌，死不瞑目！”

他们开始起草建立大龙湾工业区的报告。提出的条件是一——不要中央一分钱，只要中央给一条政策——大华公司的利润五年不上交，作为开发工业区的启动资金。

他们带着报告到北京向老司令汇报。方辛说起大龙湾沙滩陈尸的情景，司令听着，良久不语。沉默半天才说：

“我们这些人也真有本事，能把鱼米之乡搞成无米之乡，把沙滩搞成尸滩！我们对得起谁？”

董子元和方辛没有出声。

“当初我们打游击，对广东人民是许了愿的。广东父老乡亲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支持我们。为了什么？为了过苦日子？当官了，进城了，威风了，住进深楼大院，就不把老百姓疾苦放在眼里，把当初对人民起的愿忘了。这叫什么？叫忘恩负义！搞成这个样子，我们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

司令的眼眶润湿了。

司令把报告留下来，第二天，他就在报告上批示：“经部党组研究决定，同意大华公司在深圳大龙湾建区。公司利润五年不上交，用作建区经费。”

离京时，司令跟他们谈了话。

“前不久我去看叶帅。叶帅跟我说：这些年，广东受苦最深。历次运动，广东的干部打下去的最多。广东的经济很困难。我一到广东就心里难过。我跟小平同志多次研究过广东的问题，都认为应该利用广东华侨众多靠近港澳的优势，加快发展广东经济。”

司令说：“两位老人家可能最近要南下广东。他们到广东，会有大动作。不久我也会去。无面见江东父老也得见。当年的东江子弟兵被整得够呛。有些战友没有战死，却死在自己人手里。我这个当司令的得去见见他们。有些人还传说我死了呢。”

司令说得动情，谈起广东：

“广东是南大门，搞成这样，丢脸呀！广东这地方人多田少，山多水多，交通很落后。燃料动力、交通运输和粮食问题很大，物品供应很紧张。林彪死党黄永胜把持广东，提出不吃外省的东西。哪有这样干的，想饿死广东人？广东被这些家伙搞得很苦。海南岛就不用说了，更是满目荒凉。汕头非常困难。前不久，吴南生跟我聊天。吴南生，潮汕人，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你们应该知道。他说，不久前回到汕头，一片凄凉景象，到处是竹子搭的房子，马路上污水横流，简直像难民营。他气愤地说，如果有哪个电影制片厂要拍摄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的镜头，就请到汕头来。我听着都难过。潮汕人最有经济头脑，过去有句话：饿死广府佬，也饿不死潮州帮。汕头都搞成这样，其它地方可想而知。吴南生在汕头就给省委写报告，建议广东要解放思想，对外开放，广东应该先走一步。”

“现在广东的领导人习仲勋这些人，思想解放，能干大事。刘田夫现在是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省政府工作主要归他管。他是我的老拍档，也是你们的老上司。有事找他去。”

刘田夫出生外省，也是老广东了。解放战争时，东江游击队改编为两广纵队，奉命北调。刘田夫是两广纵队政治部副主任。董子元和方辛都是他的老部下。

司令说：“你们回去找刘田夫，传我一句话：在宝安深圳搞工业区，如果刘田夫支持就干，不支持就不干。”

“就这么一句？”董子元问。

“一句就够了。”

司令叮嘱他们：“拿出当年打仗的劲头，尽快把工业区搞起来。给你们交个底，你们要在深圳搞工业区，部里也有不同意见，说你们不务正业，说没有必要把钱扔到广东去，诸如此类。中国没有搞过什么工业区开发区，大家还没有真正弄清是怎么回事，有不同意见很正常。你们心里有数就行了。在深圳建区，要注意处理好省里和深圳的关系。

省港一家，老传统了。香港做事离不开广东支持。打仗时我多次说过：

为人做事，要有锐气，力戒骄气，骄兵必败。现在我还是这句话。听到了？”

董子元和方辛都点头。

“马克思没有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搞工业开发区。毛泽东也没有说过。在这方面，老祖宗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家底。靠自己闯。不要以为你们只是搞经济，对可能出现的政治风险要有思想准备。现在还有人在吹‘两个凡是’。你们会面对很多困难。不过，也没有什么好怕的。大不了再进一次秦城。既然死过一次，再死一次也无所谓。”“文化革命”教会我两件东西：一个是实事求是，要对得起人民，按良心办事；一个是对什么人都不迷信。国家搞到民不聊生，不敢为国家人民做点实实在在的好事，要这条老命干什么，当行尸走肉？”

司令这番话，董子元和方辛听来，如雷贯耳。

司令站起身：“国运维艰，苍生啼哭。当年我们提着脑袋打游击，现在也还要这种精神。看来，这是第二次解放战争，打法不一样。拿出气魄来，重上战场，搞好你们的工业开发区！今天我说得够多了，政策也给了。工业区搞不起来，别来见我！”

司令在作“战前动员”。他们肃然、凛然。

董子元和方辛在北京拟好给广东省委的报告。直飞广州。在东方宾馆住下来，当晚就去找刘田夫。

刘田夫住在东山一家小院里。看到董子元和方辛，很高兴。岁月移人，当年英姿飒爽的老首长现在头发斑白了。

刘田夫一见面就对董子元笑道：“很久没见你这炮兵团长了。今天来，准备放什么炮？”

“开山炮。”董子元也笑。

都是一道战壕里滚过的老战友，老部下，说话就随便多了。

闲聊了一会，董子元便呈上报告。

董子元说：“离京时，司令跟我们说：在广东宝安筹建工业区的事，如果刘田夫支持就干，不支持就不干。”

“还有呢？”

“没有了。”

刘田夫哈哈一笑：“这老兄向我叫板哩。你们也代我向他传句话：我这里有一瓶窖藏三十年的茅台，一直等他来。问他什么时候来。”

“还有呢？”

“没有了，就这一句。”

董子元笑道：“老主任，这话里有骨。”

刘田夫笑：“当然啰。这酒不是白喝的。广东的交通搞得这么差，不算全国最差，也是倒数三名之内。他这当部长的没有责任？喝完酒，我要叫他‘埋单’（广东话：出钱结账）。不‘埋单’出不了我这个门。”

刘田夫看完报告，一拍大腿：“好。你们来得好！我正为办出口基地的事伤脑筋。

老是考虑如何开局，树立几个样板。现在你们找上门，求之不得。毕竟是炮兵团长，这一炮开得好。我支持。当然支持！”

“老主任，说话要算数。”方辛说。

“你这小方，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你们大概不太清楚最近广东发生的情况。广东要起大风了！”

“什么风？”

“当然是东风。”

刘田夫告诉他们：不久前，老帅叶剑英和邓小平相继南下广东，商量如何加快广东发展。我和习仲勋、杨尚昆同志向他们汇报广东情况。仲勋同志对两老说，中央统得太死了。我们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仲勋同志讲话很直率。他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上去了。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这当然是个比方。小平同志和叶帅认真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小平同志首先表态支持。他决心很大，跟我们说：“可以划出一个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小平同志还说：中国要加快开放步伐。广东、福建可以先走一步，思想更解放一些，开放的步子要迈得更大一些。

刘田夫说：“最近省委就在研究这些事。你们来得正好。烂头车先过河——”

董子元笑：“刘主任，有没有搞错，叫我们烂头卒？”

刘田夫也笑：“我意思是说，中国是个大棋盘，广东的棋盘也大。目标大就掣肘多。

你们那儿地方小，目标小。在大棋盘上像个车子。你以为车子小呀？卒子过河当车用。

卒子也是开路先锋。你们就当新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开路先锋。子元，你这炮兵团长就到宝安再打一仗吧。打出志气，打出经验，打出水平来！省里的事情我来办。”

广东省委很快形成决议，批准大华公司筹建大龙湾工业区的报告，并将他们的报告连同省委的意见是报中央。

不久，中央电召董子元进京。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和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接见董子元，听取了他的汇报。

听完报告，李先念问谷牧：“这事你看怎么办？”

谷牧说：“你在上面签个同意，具体的事我来办。”

“好。我批。”

李先念亲笔批准了建区的报告，给工业区发了“准生证”。

搞一个小小的工业开发区，要从部里、省里直到中央，最后由主管国家经济的副主席批准，绝不是天方夜谭。

副主席放下笔，扔下一句重话：‘你们搞工业区，中央支持。可是，中央没有钱给你们。生死存亡自己管。你们自己去奋斗。’

新中国第一声开放改革的进军号便在祖国南疆边陲一个荒山野岭吹响。大龙湾开山炮一响，香港的电波一传，全世界都能感觉到它的震动……

